

# 红旗



一九五九年 20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五九年第二十期★

## 目 录

伟大的十年 ..... 周恩来 (1)

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 李井泉 (16)

为加速实现农业技术改造的伟大任务而奋斗

..... 薄一波 (24)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正确路线 ..... 张鼎丞 (31)

换了人间 ..... 马锡五 (38)

各地党委刊物论文摘要

马克思主义大放光辉的十年 ..... “团结”社论 (45)

坚持政治挂帅的方针 ..... 陈丕显 (47)



# 伟 大 的 十 年

周 恩 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十周年的時候，世界上的人們不管政治見解如何，都不能不承認，中國發生了真正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人民由人間地獄的奴隸一變而為自己命运的大無畏的主人。全國人民以歡樂的心情回顧着已經取得的伟大的勝利，同時充滿信心地瞻望着將來。

讓我們來看看，中國十年來究竟經歷了一些什么样的變化，為什麼會發生這些變化，人們從這些變化中可以得到什么主要的教訓。

盡人皆知，十年前的中國是一個經濟極端落后的國家。當時中國在世界各國中，鋼產量占第二十六位；發電量占第二十五位；煤產量高一些，占第九位；就是比較發達的棉紡業的產品——棉紗的產量，也只占第五位。全國產業工人只有三百萬人，不足全國人口的千分之六。老大的中國素稱以農立國，但是在解放以前的几十年間，小麥、大米和棉花每年都需要從外國進口。根據海關統計，一九三三年曾進口糧食六十億斤，一九四六年曾進口棉花六百九十万担。對外貿易長期入超，國家財政連年入不敷出。從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戰爭開始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的十二年間，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通貨增發了一千四百多億倍；物價上漲了八萬五千多億倍。

當時中國的情況如此悲慘，以至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在一九四八年二月間向美國參眾兩院外交委員會的行政會議宣讀的聲明中，不得不承認美國不斷傾注的大量援助，無法挽救中國的經濟危機；並且斷定“中國缺乏原料和工業資源”，在最近的將來難于成為第一流強國。一九四九年八月間，繼馬歇爾擔任國務卿的艾奇遜，在他致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信中，嘲笑了中國共產黨關於“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的“種種諾言”，預言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任何政府也不會得到成功。

但是，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毛澤東同志在北京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的開幕典禮



上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将会看見，中国的命运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設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誰的預言應驗了呢？

按照調整以后的一九五九年計劃的預計完成數（現在已經可以看出，这个計劃的大部分指標都將超額完成），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將比一九四九年增長四點三倍，其中工业总产值將增長十點七倍。鋼產量将达到一千二百万吨，比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八千吨增長七十五倍；煤產量将达到三亿三千五百万吨，比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二百四十三万吨增長九倍多；发电量将达到三百九十亿度，比一九四九年的四十三点一亿度增長八倍多；棉紗產量将达到八百二十万件，比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八十万件增長三點五倍。在一九五八年，我国的鋼、煤、发电量和棉紗已經分別跃居世界的第七位、第三位、第十一位和第二位。旧中国进行了将近一百年的現代工业建設，到一九四九年，工业固定資产還不到一百三十亿元；而新中国十年，新增加的工业固定資产，却达到四百五十亿元左右。旧中国发展電业近七十年，到一九四九年，发电能力還不到一百九十万瓩；新中国十年，新增加的发电能力，就等于这个数字的三倍以上。旧中国建設鋼鐵工业近六十年，到一九四九年，炼鋼能力還不到一百万吨；新中国十年，新增加的炼鋼能力，就超过了这个数字的十倍以上。

帝国主义分子譏笑我們調整以后的一九五九年計劃是“大跃退”。大家知道，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特大跃进的一年，經過核實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了百分之六十六。調整后的一九五九年工业指标比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仍然高出百分之二十五点六。显然，这是在特大跃进的基础上繼續大跃进。这种跃进的速度，是帝国主义国家做梦也不敢想象的。就拿我們的发展速度跟两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比較一下吧。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八年的九年中，我国工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十八，而美国是百分之三点七，英国是百分之二点九。在我国工业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美国工业比上年降低了百分之六点五，英国降低了百分之零点九。如果我們的速度叫做“大跃退”，請問他們的速度該叫做什么呢？

资产阶级的評論家們为了贬低我們大跃进的伟大意义，还提出另外一个似是而非的謬論。他們說，中国发展速度快，只不过是因为中国原来的水平太低罢了。但是，实际的情况究竟是怎样呢？我們的发展速度不仅表現在每年平均增長的百分比上，而且表現在每年增長的絕對数量上。我国的鋼產量，一九四九年是十五万八千吨，一九五九年将达到一千二百万吨，即十年間增長了一千一百八十四万二千吨，大致相当于美国历史上从一八七二年到一九〇一年的二十九年間所增長的数量，或者相当于英國历史上从一八六九年到一九三六年的六



十七年間所增長的數量。為什麼美國和英國當時不能用中國現在這樣躍進的速度發展呢？資產階級的詭辯家，你們還拿得出什麼論據來為資本主義國家爬行的速度解嘲呢？

由於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如此迅速地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和生產資料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在一九四九年分別為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二十六點六，到一九五八年已經分別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三點六和百分之五十七點三。現在我們已經開始自己生產約五百種鋼和六千種鋼材，多種新式重型機床，二千五百噸的鑄造水壓機，采煤和煉焦的成套設備，一千五百多立方米的大型高爐設備，噴氣飛機，各種汽車，拖拉機，載重量五千噸的海輪，七萬二千五百瓩的水力發電設備和五萬瓩的火力發電設備，全套紡織、造紙和制糖的設備，等等。工業的分布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鋼鐵工業原來百分之九十以上集中在東北，現在除西藏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區都建設了大小多少不等的鋼鐵工業基地。發電廠原來只集中在少數大城市和工業基地，現在全國各大中小城市以至若干農村都有了不同規模的發電站。紡織工業原來主要集中在上海、青島、天津、無錫等幾個城市，現在全國多數省份都已經新建了許多新型的紡織廠。從前內蒙古、新疆、青海、甘肅等許多荒僻地區和人口很少的城市，現在已經建立起大規模的工業基地。這一切事實說明，我國工業化的基礎已經建立起來了。世界上無論什麼力量，也不能阻止我國在不太長的時間內，發展成為繁榮富強的工業大國。

我們在發展工業的時候並沒有忘記發展農業。十年之間，我國農業總產值將增長一倍半。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將達到五千五百億斤，比一九四九年的二千一百六十二億斤也將增加一倍半；棉花產量將達到四千六百二十萬担，比一九四九年的八百八十九萬擔將增加四點二倍。我國糧食總產量從一九五二年起就占世界第一位，棉花總產量去年占世界第二位。當然，按人口平均計算，我國的農業水平，跟工業水平一樣，還是很低的。但是問題的關鍵是發展的速度。雖然我國的農業機械和化學肥料都還非常少，而美國比我們多出不知多少倍，但是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我國糧食產量增長了百分之一百三十，美國只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五；我國棉花產量增長了百分之三百七十二，美國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八。

農村中的基本建設迅速地發展了。解放初期，全國灌溉面積只有二億四千萬畝；由於過去十年來興建了大量的農田水利和水庫工程，灌溉面積已經達到十億畝以上。農村中還興建了大量的主要是為農業服務的小工廠。跟農業有密切關係的林業、牧業、副業、漁業也有了顯著的發展。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全國造林面積累計達到五億畝，大家畜從六千萬頭增加到八千五百万頭，豬從五千七百多萬頭增加到一億六千万頭。

適應着工農業的發展，交通運輸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一九四九年我國鐵路的通車里程還不到二萬二千公里，一九五八年已經增加到三萬一千多公里。現在，全國各省和自治區，



除了西藏以外，都有了铁路。在同一期间，公路从八万公里增加到四十万公里。一九五〇年我国的民用航空航程里程只有一万一千多公里，一九五八年已经增加到三万三千公里。货物周转量，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这九年期间，铁路增加九倍多，汽车增加二十六倍多，轮船增加九倍多。木帆船、兽力车等非机械化运输也有显著的发展。九年期间完成了许多工程巨大的建设，如成渝铁路、宝成铁路、鹰厦铁路、天兰铁路、包兰铁路、武汉长江大桥、青藏公路、康藏公路、新藏公路等；正在建设中的，有兰新铁路、川黔铁路、内昆铁路、湘黔铁路等和长江黄河上的几座大桥。由于大量的简易公路的修建，一九五八年全国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七的县城能通汽车。邮电和广播事业也发展得很快。全国邮电机构从一九四九年的二万多处，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六万多处。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已经有百分之九十八通了电话。

一九五八年我国的商品零售额比一九五〇年增长二点二倍。各种主要消费品的销售量同一九五〇年比较，粮食增长百分之六十二，食用植物油增长百分之九十七，食盐增长百分之九十四，食糖增长三倍，水产品增长二点四倍，棉布增长一点二倍，机制纸增长二点七倍。由于消费品供应的不断增加，由于投机商的彻底消灭，由于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和银行信贷的平衡，一九五〇年以来我国的物价一直是稳定的，仅仅对于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作了若干有计划的调整。

十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也有巨大的变化。在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以后，海关管理权从帝国主义手里收回了，在进出口贸易中，长期入超的局面也开始扭转过来了。一九五八年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比一九五〇年增长二点一倍，其中进口增长一点九倍，出口增长二点三倍，进出口基本平衡。进口的物资跟解放前以消费资料为主的状况相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机器设备、原料材料等各项生产资料，这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了巨大的作用。我国出口的物资主要还是农产品，但是工业品出口所占的比重，也已经由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九点三，逐步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五。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预料，“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全国高等学校学生由十一万七千人增加到六十六万人，增长了四点七倍；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由二十二万九千人增加到一百四十七万人，增长了五点四倍；普通中学学生由一百零四万人增加到八百五十二万人，增长了七点二倍；小学生由二千四百四十万人增加到八千六百万人，增长了二点五倍。一九五八年许多县市已经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全国学龄儿童百分之八十五已经入学。在职工、农民和城市居民中的扫盲运动和业余文化学习，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各级学校中，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从而在教育战线上深入地开展了社会主义的革命。



科学的研究工作在十年中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一九五八年年底，全国已有专门的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八百四十多个，研究人员三万二千余人，比解放时分别增加了约二十倍和五十倍。

在同一期间，出版事业，电影、戏剧和其他艺术事业，都有了巨大的增长。

十年来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也很快。一九五八年全国有医院和疗养院五千六百多所，病床四十四万张，比一九四九年增长四倍多。此外还新建了九十多张简易病床，分布在小城市和乡村。一九五八年我国的卫生技术人员达到二百一十六万人，比一九五〇年的七十八万人增加了一点八倍。

随着各方面建设事业的发展，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这个事实，从上面所说的商品零售额的增长和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说明。一九四九年全国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共有职工八百万人，到一九五八年已经增加到四千五百多万人，即增加了四点七倍；其中产业工人由三百万增加到二千五百六十万人，即增加了七倍半。不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已经完全消灭，而且就业面已经显著扩大，全国城镇人口中平均每五个人就有两个人就业。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我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增加了一倍以上，农民个人收入增加了将近一倍。全国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从一九四九年的六十万人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一千三百七十八万人。全国农民在参加了人民公社以后，绝大多数缺乏劳动力的人口享受着免费供给粮食或伙食的待遇；从前愁吃愁喝的困难生活，快要变成历史的回忆了。

国家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给予极大的注意。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八年，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超过七十亿元。现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建设了新的工业基地，修通了铁路和公路。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在一九五八年等于一九四九年的十倍，粮食产量和牲畜也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一倍以上。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销售额，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四点七倍，收购额增加了五点二倍。少数民族学生数相当于解放前的九倍以上。医院和疗养院已经达到七百七十五个，共有床位三万四千多；此外还有医疗保健所（站）一万四千多个。各少数民族几百年来人口不断减少的倾向已经完全扭转了过来，出现了经济文化生活蒸蒸日上的新气象。西藏地区过去因为民主改革长期受到阻挠，情况比较特殊；但是在叛乱平定以后，人民也积极地开始了向新生活的进军，幸福和进步的西藏不要很久就会建设起来。

人们也知道，十年前的中国，国家的政治状况是极端黑暗和反动的。帝国主义者的走狗——买办资本家、封建地主、军阀官僚和土豪劣绅，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敲骨吸髓。广大人民处在绝对无权的奴隶般的地位。许多少数民族的人民，除了遭受帝国主义者和本民



族的貴族、地主、奴隶主的压迫以外，还遭到汉族統治者的民族压迫。国家长时期內是分裂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各派軍閥的混战和反动統治者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几十年間連綿不断，使人民飽受战祸。在国民党統治时期，盜匪、流氓、会道門到处猖獗，社会秩序混乱不堪。

十年来这一切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压在人民头上的貪污腐化的恶政府消灭了，代之而起的是人民世世代代所梦想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廉洁勤劳的政府。人民无权的状况已經永远結束；极其广大的人民，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享受着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最廣闊的民主。民族被压迫的現象消灭了，我們的祖国已經成为各民族完全平等和友愛互助的大家庭。国家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巩固的統一。盜匪、流氓、会道門以及娼妓、乞丐、賭場和毒品，一概清除了，社会秩序极为安定。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精神振奋、斗志昂揚、干劲冲天地建設着自己的幸福生活。

人們也熟知十年前的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处在怎样悲慘的地位。多年来我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列强把我国看作是一块肥肉，誰都在啄食它。欧洲的帝国主义者企图瓜分它；日本侵略者要求独吞它，并且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間已經独吞了它的几乎一半；美国在第二次大战以后，一心一意地要繼承日本侵略者的地位。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但在世界政治生活中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而且几乎被剥夺了处理自己的事务的权利。

現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出現在人們面前的是独立自由的人民新中国。正如毛澤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所宣告的那样：“我們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态工作着，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中国的衰弱正在走向它的反面——强盛。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无权地位也正向它的反面起变化。在已經解放了的全部土地上，它已經充分地行使自己国家的主权；它也必須有权参与一切关系到它的利益和世界和平利益的重大国际問題。美帝国主义在发动侵略朝鮮战争的同时，侵占了我国的領土台湾，并且企图把侵略的火焰从朝鮮扩大到中国大陆，妄想用武力把刚刚誕生的新中国消灭掉。中国人民进行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粉碎了这个侵略阴谋。台湾虽然至今还为美帝国主义所侵占，但是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了的。美帝国主义至今还力图在国际事务中孤立和排斥新中国，但是这个企图也一天一天失敗了。現在，同我国建交和半建交的国家，已經有三十三个；同我国建立經濟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經有九十三个；建立文化联系和进行友好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已經有一百零四个。我們同伟大的苏联和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地團結在一起。我国根据“五項原則”和万隆宣言，同亚洲、非洲許多民族主义国



家建立了和发展了友好合作的关系，組成了广大的和平地区。我国作为世界大国之一，作为以苏联为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員，对于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作了并且正在作着应有的貢献。

怎样来解释这一切飞跃的发展呢？它們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人民中国的飞跃发展，根本上是由于中国社会经历了最彻底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已經成为以生产資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人民如果不把压在自己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推翻，当然就只能无限期地沉淪在貧穷和落后中間。但是如果在推翻这三座大山之后，不立即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发展有計劃的社会主义建設，而是象有些在取得民族独立以后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国家一样，那么，也决不可能有十年来的飞跃发展，更不用說去年以来的大跃进了。

認為一个国家經濟文化落后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种反动的論点早已被列寧和毛澤东同志駁得体无完肤了。至于說，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事业为什么发展得如此迅速，如此順利，那么，應該指出，这里有客觀的条件和主觀的条件。在客觀上，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人民群众有革命的要求和革命的传统；中国革命发生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中国能够利用苏联的經驗和苏联的援助，能够利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在主觀上，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領袖毛澤东同志的正确領導，由于这种领导善于把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結合起来，善于把苏联和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的建設經驗和中国的建設經驗結合起来，善于按照中国的条件，把馬克思列寧主义的不断革命論和馬克思列寧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論結合起来，善于按照中国的条件，貫彻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把党的领导和千百万人民的群众运动、千百万人民的积极性創造性結合起来。在这里，我們想就党和毛澤东同志的领导方法，特別是关于不断革命的方法和群众路綫的方法，稍微多說几句。

中国十年来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

还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就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是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同时也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在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中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虽然吸收了一部分民族資產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实质上已經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在这个时候，全国范围的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統治的問題，已經解决了，國內的基本矛盾已經是无产阶级和資產阶级之間的矛盾了。革命不應該在民主革命阶段上停頓下来，必須繼續向前发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



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最初几年間，中国人民还需要用很大的努力来完成民主革命阶段所留下的任务，其中主要是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但是，人民大革命在一九四九年取得全国胜利以后，由于沒收官僚資本，把官僚資本所有制的經濟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經濟，这样，就在經濟方面來說，已經超出民主革命的范围。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营經濟，确立自己在整个国民經濟中的领导地位，已經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头等重要的任务。針對資产阶级不法分子破坏社会主义經濟的活动，党在一九五二年領導了“三反”（在国家机关人員中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义）“五反”（在資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窃国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窃国家經濟情报）的群众斗争，給了資产阶级的进攻以粉碎性的打击，并且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使資本主义工商业向着服从社会主义經濟领导、接受工人阶级监督的国家資本主义，大大前进了一步。在土地改革后，党中央及时地发出了关于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大力鼓励和促进个体农民走上合作化的方向，并且不断地同在这个問題上的右傾思想展开了尖銳的斗争。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坚决地駁斥了党内外一部分人所謂“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长期共存”、“保証农村中土地买卖租佃、雇工、借貸、貿易的四大自由”等資产阶级观点，及时地提出了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同时并进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綫。这条总路綫迅速地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并且被規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由于党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使革命运动不停頓地步步前进，終於在一九五五年秋冬出現了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而这一高潮又推动了全国資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也推动了个体手工业者組成为手工业合作社的高潮。这样，就在基本上完成了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就此結束。接着不久，党提出了新的任务，就是：必須在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繼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要把这一革命进行到底。必須使上层建筑的各个領域能够进一步地同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相适应；同时，在已經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資料所有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調整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健全和发展。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的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的任务。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的結果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資产阶级右派在人民中間彻底地孤立了，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地提高了。人民內部的矛盾进一步得到了正确的处理，因而无论国家机关和企业中的工作人員跟工农群众的关系，工农群众内部的相互关系，或者各民族相互間的关系，都进一步地改善了。由于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的胜利，全国人民的建設社会主义的革命积极性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建国以来不断向前发展的革命运动，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即第二个五年計劃时



期的头两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收获，这就是国民经济的大跃进。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本来是很高的，但是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前五年的水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八，而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年（一九五九年是计划数——下同）两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四十五。钢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第一个五年是百分之三十一七，近两年是百分之五十；煤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第一个五年是百分之十四点四，近两年是百分之六十。在农业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四点五，而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年两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七。粮食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第一个五年是百分之三十七，近两年是百分之二十二；棉花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第一个五年是百分之四点七，近两年是百分之十九。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的工业建设单位接近一万个，而一九五八年一年就建成了四万一千多个。其中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第一个五年全部或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为五百三十七个，而一九五八年一年就达到七百个。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我国经济能够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更高速度地发展的原因何在呢？这不但因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的迅速发展准备了有利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在第一个五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正在进行，还没有完成，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同志式的关系还没有充分建立，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影响还严重地存在着，而这一切都限制着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第一个五年的后半期，即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連續不停地取得伟大的胜利，社会生产力和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获得了空前的解放，而我们党又根据这种有利形势，及时地提出了和执行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是由于这一切，我国人民才能够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开始的时候就开辟一个大跃进的新局面，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大提高。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适应于这种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建立起来以后，还是处在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不能是固定不变的。为着适应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的要求，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随时需要进行调整，随之，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也随时需要革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不断地产生而又克服，克服而又产生，这是一个川流不息、万古常新的辩证法的过程。正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它的上层建筑能够按照需要而不断地调整和革新，所以才能够保证生产力的不断高涨。在一九五八年我国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中出现的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展，就是这个真理的一个新的证明。在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巨大发展的需要面前，原来



的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經覺得不能适应了。全国的七十四万多个农业社，平均每社約一百六十戶，在一九五八年夏秋之間合併改組成为二万六千多个公社，平均每个公社約四千六百多戶，以后經過整顿，又改組成为二万四千多个公社，每社平均五千多戶，也就是說，規模相當于原来农业社的三十多倍。公社由于規模大，力量大，就不但可以迅速发展农林牧副漁各业的生产建設，而且可以統一領導农村中的工农商学兵各方面工作，实现經濟組織和基层政权組織的合一。农村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經濟組織，主要的生产資料仍然属于大致相當于原来农业社的生产队所有，但是公社一級已經拥有部分的生产資料，并且每年可以从各生产队提取相当的积累，在社員收入的分配制度中也包含了一定范围的供給制成分。在人民公社化胜利了的一九五八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其中林业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九十三点二，渔业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八，牧业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五点二。全国的农田水利建設和造林的面积，都远超过第一个五年計劃时期五年的总和。人民公社的工业和运输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最近整社以后的統計，全国人民公社約有七十万个工业单位，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了两倍。一九五八年农村人民公社的积累达到一百亿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一倍多。全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在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平均提高了百分之十左右。这一切事实，說明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是无可怀疑的，反对这一运动的人們的任何“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从一亿一千多万个个体农户变为二万四千多个公社，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論一个多么光輝的胜利！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同时又是按照一定的发展阶段循序渐进的过程。如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決議所說，“我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論者，我們認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間，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沒有隔着也不允許隔着万里长城；我們又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論者，我們認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質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質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实际上，我們不但認真地区別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認真地区別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共产主义的原则，反对超越必經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而且在每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还按照具体情况，認真地区別若干相对地属于量变性质的較小的发展阶段（从一个較小的发展阶段到另一个較小的发展阶段，当然也是一种較小的質变），采取适当的步骤，以适应生产关系的逐步演变和群众觉悟的逐步成熟的需要。广大农民能够自觉自愿地由个体經濟进入到人民公社，是因为他們經過了互助組、常年互助組、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等一系列阶梯。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能够不太勉强地接受全行业公私合营，也是因为他們经历了工业方面的加工定貨、統購包銷，商业方面的經銷代銷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等一系列阶梯。同样，政治战綫、思



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也是經歷了一系列的群眾運動，適應着階級鬥爭的具體情況，高一陣、低一陣地波浪式地前進和逐步深入的。黨的這種正確的領導，既能使群眾的革命熱情經常飽滿，不至因為革命發展的中途停頓而冷卻，又能使群眾的覺悟步步提高，不至對於革命的發展缺乏準備。因此，黨在社會主義革命整個過程中的每一個號召，就能夠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支持。也因此，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雖然很迅速，工農生產却始終是繼續高漲着，基本上沒有引起什麼破壞。

黨在運用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方面得到的成功，同黨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整個過程中始終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是分不開的。黨始終注意使自己的領導同廣大的群眾運動相結合，引導群眾不斷地發展革命的自覺，組織自己的力量去逐步地解放自己，而不是把革命強加給群眾或者把勝利恩賜給群眾。關於這一點，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談過，因為黨在民主革命過程中就是堅持這種工作方法而取得勝利的。在這個問題上的新的事物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獲得了全面的勝利以後，党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繼續把這種工作方法有系統地運用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中，從而形成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從而展开了國民經濟大躍進的局面。完全可以說，離開了黨的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就不会有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也就不会有去年以來的國民經濟大躍進。

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本質，是對人民群眾的在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中的覺悟性、積極性、創造性的高度的重視。總路線要求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是號召六億五千万人提高自己的覺悟性、積極性、創造性，把自己的熱情、智慧和力量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充分地動員起來。社會主義建設要進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解決這個複雜的、困難的任務是可能的嗎？帝國主義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告訴我們說：不可能。他們斷言多快和好省二者不可兼得，要求兼而有之就無異于“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我們隊伍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附和他們說，不可能。但是我們堅決地回答說，可能。因為我們所依靠的，首先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群眾，這正是一切帝國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分子以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不可能了解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力量。我國有極為廣大的人力，而作為勞動者和生產工具的創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會生產力中的決定性的要素，是最寶貴的“資本”。當然，六億五千万人民的積極性，這個極其偉大的創造的力量，如前所說，沒有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發揮出來的。但是，就在實現了社會主義革命以後，如果不注意用適當的方法去調動它，仍然不可能充分地發揮出來，因而仍然不可能達到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黨的總路線根據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客觀法則，正確地安排了工業和農業、重工業和輕工業、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業的關係，規定了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重工業和輕工業同時並舉；在集中領導、全面



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实行这样的“两条腿走路”方针，不但为了保持各个经济部门间的必要的平衡，而且首先是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开辟最广大的阵地，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建设队伍能够展开，使他们的力量能够最充分地使用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来，从而使多快好省要求的实现得到保证。中小型的、土法的或者半土半洋的工业，劳动生产率虽然不及大型的、洋法生产的工业，但是比起过去的简单的手工劳动来，劳动生产率却显然是大大提高了。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在发展大型的、洋法生产的工业的同时，注意发展中小型的、土法的或者半土半洋的工业，并不是浪费了人力，而正是合理地利用了人力；并不是延缓了工业化的速度，而正是大大加速了工业化的速度。同时，无论在什么经济部门和什么企业内，都实行了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这样，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工业化的任务，就成为最广大群众所直接参加和积极参加的事业，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全民办工业。

在我党有些人之所以陷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不承认人民群众在建设事业中的主动积极作用。他们反对党的总路线，特别反对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企业并举和洋土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反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说那样作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其结果是“只能多快，不能好省”，“得不偿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抓住工作中的个别的、暂时的缺点，不加分析，而且任意夸大，来达到否認大跃进、反对总路线的目的。对于他们的这一切不信任群众、害怕群众和污蔑群众的论调，事实是最好的反驳。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果然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果然“只能多快，不能好省”，“得不偿失”吗？大家知道，在大跃进中，由于劳动人民鼓足干劲，许多重大建设工程提前完工和投入生产。例如武汉钢铁公司日产两千多吨铁的现代化的大高炉，原计划二年建成，只用了十四个月的时间就投入生产。鞍山钢铁公司日产一千多吨钢的现代化的大平炉，原计划十个多月建成，只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就投入生产。过去建设的官厅水库，土石方工程量一百四十五万立方米，设计库容二十二亿七千万立方米，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建成。最近新建的密云水库，土石方工程量二千零五十六万立方米，设计库容四十一亿立方米，只花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一千四百六十七万立方米，并且发挥了拦洪作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这样大的建筑，只用了十个多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它的精美程度不但远远超过我国原有同类建筑的水平，在世界上也是属于一流的。而所有这些建设的投资，都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同类工程少得多。以钢铁和煤炭工业建设为例：过去建设大型高炉每立方米容积的平均投资为二万五千元，现在只需要一万四千元到一万八千元，降低了百分之二



十八到四十四；过去建設大型煤矿每吨生产能力的平均投資为三十三元，現在只需要二十二元，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三。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难道誰能够說，这些建設只有多快，沒有好省嗎？在生产方面，同样既实现了多快，又实现了好省。一九五八年不但工业产品的产量大大增加了，而且由于充分地发动群众，千方百計地克服困难，試制成功了大量的新产品，其种数差不多等于第一个五年計劃时期五年的总和；这些新产品中有不少是高級的、精密的、大型的、复杂的、尖端的，已經达到或者接近世界水平的。同样，由于充分地发动了群众的集体智慧，我国各种生产設備的利用系数在两年来不断提高；其中高爐、平爐、机車等的利用系数，都已經达到世界上的最高水平。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中央各工业部五年合計总共降低成本百分之二十九，而一九五八年一年就降低百分之十二点五。請問那些認為有了多快、就不能有好省，在工业中展开了群众运动，就会乱成一团、得不偿失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們，你們怎样来解释这一切呢？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用某些小型土法生产特別是小高爐的初期产品質量比較低、成本比較高的事实，来攻击党的总路綫。但是，他們在这里仍然是只見树木，不見森林。他們沒有看到，这些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設的大跃进中，發揮着怎样巨大的作用。一九五九年，我国将要生产二千万吨生鐵，其中約有一半是小高爐生产的。我們多年来建設的大中型高爐的总容积約为二万四千立方米，而两年来新建的已經正常生产的小高爐的总容积就达到四万三千立方米以上。至于小高爐的生产技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犹如大高爐一样，更是絲毫不用大惊小怪。經過今年上半年的努力，小高爐的利用系数和产品質量已經大大提高，成本已經大大降低，其中比較好的已經接近大高爐的水平。現在小高爐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繼續發揮。估計在第二个五年計劃期間，小高爐产鐵总量大約可以达到五千五百万吨到六千万吨。今年中小煤矿所生产的煤，在煤的总产量中将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因此，离开了我們所說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針，离开了这个在工业化事业中的群众路綫的方法，也就沒有了大跃进，沒有了总路綫。

最近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評了右傾保守思想，号召全国人民反右傾，鼓干劲，开展轟轟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这一个切合时宜的决定，已經在全国劳动人民中掀起一个新的生产高潮。据国家統計局統計，八月份的工业总产值，比七月份增长了百分之十四，九月份又比八月份猛增百分之二十七左右。鋼产量八月份比七月份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五，九月份又比八月份增长百分之二十。煤产量八月份比七月份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五，九月份又比八月份增长百分之十八。一月到九月合計，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五点五，鋼产量增长百分之六十七，煤产量增长百分之七十二。全国的货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十九。商品收購額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二，商品零售額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六。九月底商品



庫存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二，市場供应情況良好。我国的农业生产，今年虽然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灾害，但是依靠我們在水利建設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別是依靠新誕生的人民公社领导千千万万农民同灾害进行了紧张的斗争，許多地区的灾情已經克服，可以希望在去年特大丰收的基础上，获得比去年更大的丰收。

所有这些情况可以充分証明：第一，多快好省的要求是完全現實的，它已經开始实现，而且以后随着經驗的丰富，还将繼續更完滿、更有效地实现；第二，为了实现这个要求，必須貫彻执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針，使英雄的广大群众都有用武之地；第三，为了实现这个要求，必須在每个企业中有領導地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发揚广大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創造性，领导他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事实上，在全国范围内执行“两条腿走路”方針，和在每个企业內开展群众运动，正是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运用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的两个方面。

由此可見，不但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运用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这就保証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非常迅速、非常順利的发展，这就保証了我国十年來特別是最近两年來的飞跃式的发展。

經過两年來的大跃进，第二个五年計劃建議原定的一九六二年的主要指标，可以在今年超額完成。这样我們就有可能在今后三年使工农业生产获得更大的发展，并且可以腾出手来加强某些薄弱环节。完全可以預料，第二个五年計劃时期必然是一个大跃进的五年。既然在过去十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那末今后十年必然会有更大的变化。那时候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绝大部分都将超过英國。

当然，我們的跃进还只是在开始。对于國家和人民的需要說來，我們的工作还很不够，我們的經驗也还很不够。我們必須繼續刻苦地努力工作和努力学习，繼續在我們自己的工作中認真地总结和积累經驗，并且繼續認真地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先进經驗。但是无论如何，我們已經奠定了飞跃发展的基础，并且找到了繼續跃进的道路。无论帝国主义者和各國反动派怎样污蔑我們，也无论國內的資產阶级右派以至我們黨內的某些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怎样反对我們，都决不可能破坏我国人民所已經奠定的基础，或者改变我国人民所已經选择的道路。人民描写自己的人民公社是“雷打不散”。这不但是广大群众对于我們的人民公社运动的結論，这也是广大群众对于我們的总路綫、大跃进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結論，这也是广大群众对于我们党和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团结的結論。

国际的条件同國內的条件一样有利于我們的跃进。首先，由于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義陣營的强大和团结，由于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斗争的发展，和平和进步的力量正在愈来愈显著地超过战争和反动的力量。这个事实，在赫魯曉夫同志訪問美国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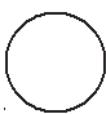
功中得到了新的、显著的表现。其次，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首先是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争取独立民主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我国人民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時候，特別要感謝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援助我国建設了一百六十六個項目，去年和今年又新訂了援助我国建設一百二十五個項目的協議，并且在十年中先后派遣經濟、文教专家一万零八百多人來華工作。同时，也要感謝其他社会主义國家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援助我国建設了六十八個項目，以后又新訂了援助我国建設四十多個項目的協議，并且先后派遣一千五百多个专家來華工作。我們所取得的成就是同兄弟國家人民的巨大援助分不開的，他們的热情和友誼是我国人民所永远不能忘懷的。我們應該永遠堅持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相結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不斷地巩固和发展同他們的兄弟般合作。

為了在第二个十年內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超过英國，我們必須努力加強目前工业体系中的某些薄弱环节，并且必須繼續大力加强农业，以便在保証粮食作物繼續增长的同时，使輕工业获得充分的原料来源。很明显，在达到这个目标以后，我們的經濟水平仍然不能算高。我們还需要以西方資产阶级所不敢設想的速度，繼續前进到更远大的目标。我国人民已經抱定坚定的决心，要在不太长的時間內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困难无疑总是有的，而且不少，但是这永远不会把我們吓倒。回顧过去的十年的成就，总结过去十年的經驗，我們就有了充分的信念：只要我們坚持貫彻执行党的总路綫，只要我們坚决地依靠全国人民大团结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这样两个伟大的力量，在新的十年內，我們一定能够更順利地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取得更光輝的胜利。

讓我們全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战无不胜的旗帜下，为建設我們的伟大祖国而繼續鼓足干劲，奋勇前进吧！

(原載1959年10月6日人民日報)



# 人民公社是我国 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李井泉

标志着中国人民的伟大創造、具有无限生命力的人民公社，誕生已經一年了。人民公社是适应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社会主义觉悟大高涨的产物，是在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組織。經過整顿，它迅速地走上了巩固而又健康的发展道路，为发展农业、为支援工业作出了伟大的貢献。正当举国人民为人民公社的伟大成就欢欣鼓舞的时候，国内外敌人却对它进行恶毒的誣蔑和攻击，我們队伍中也出現一小撮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与国内外敌人的叫囂遙相呼应，肆意非难人民公社，說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說什么人民公社“是少数人主观臆造出来的，不是广大农民的要求”，还說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應該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工資制与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搞坏了”，“公共食堂是强迫命令搞起来的”，等等。他們否認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的必然产物，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否認人民公社所采取的若干新制度，是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迅速改变我国貧穷落后状态的反映；否認人民公社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过程中已經起的和将要起的伟大作用。

国内外敌人之所以誣蔑和攻击人民公社，不是因为别的，而正是因为人民公社好。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当了国内外敌人对人民公社恶毒攻击的应声虫，百般地非难人民公社，那种非难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是广大干部和群众所坚决反对的；就是那些对个别問題持怀疑态度的人，也是不贊同的。

毛泽东同志曾經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間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經濟基础之間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經濟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况罢了。”<sup>①</sup> 有矛盾就

<sup>①</sup>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頁。



需要解决。一个矛盾解决了，又会有新的矛盾需要解决。我們的农业合作化解决了个体經濟和社会主义經濟之間的矛盾。在这个矛盾基本解决以后，又出現了农业合作社的規模比較小、經營範圍比較狹不能适应生产力大发展要求的矛盾。人民公社的产生就是为着解决这个矛盾。

由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由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表明我們的革命的发展是有阶段的，同时又是不停頓的。

毛澤东同志发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发展阶段論的原理和不断革命論的原理。我們正是在毛澤东同志的革命发展阶段論和不断革命論相結合的思想的指导下，使革命由一个胜利轉变到另一个胜利。人民公社化是我們一个突出的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同时又証明了毛澤东同志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論和不断革命論相結合的思想是百战百胜的。

我們回顧一下解放以来我国农村一系列变化的过程，就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产生和发展，决不是偶然的。

解放初期，我們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土地改革的胜利，彻底摧毁了严重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这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道路的第一步。接着，在党的领导下，又在农村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原来处于极端貧困的、具有强烈革命要求的中国农民抛弃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最初是在个体經濟基础上建立了集体劳动的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質的互助組織；然后又使互助組发展到以土地入股、統一經營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質的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来又再进一步地实现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資料的集体化，建立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質的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系列的生产关系的变化，都是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而生产关系的每一次变革，都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已为农业生产不断增产的事实所証实。从四川省历年粮食总产量的增长情况来看：一九五四年农村互助組織大量发展以后，比一九五三年增长了百分之六点六；一九五五年冬实现了初級合作化后，一九五六年比互助組时的一九五四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四；一九五六年冬实现了高級合作化后，一九五七年由于反“冒进”的影响，增产的幅度不大，但是，一九五八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鼓舞下，生产有特大跃进，粮食产量比一九五六六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六。

农业合作化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途径的第二步。

农业合作化实现以后，我們在农村进行了伟大的整風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着这个运动而来的，是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生产热情的普遍高涨，他們迫切要求高速度地发展生产，要求迅速地摆脱我国农村貧穷和落后的状况。在全国农业发展綱要(草案)的鼓舞下，一九五七年冬至一九五八年春在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設运动、改良土壤和植树造林运动。在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以后，农村的生产建設高潮以更广大的規模向前



发展。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展了以改革农具和制造土化肥为中心的大办地方工业的运动；在全面总结我国农业生产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促进了农业的技术革新。生产的大发展在人们面前预示着农业机械化、电气化、耕作园田化的农村美好前景，许多地方拟定了实现这种美好前景的宏伟规划。所有这些，都证明在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空前大跃进的新形势下，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迫切的要求。

原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开展生产运动和实现各种生产建设规划的实践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首先是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更合理地安排和使用劳动力。据当时的典型调查，单是水利建设、深耕土地和采取合理密植等先进农业技术，就需要增加一倍左右的劳动力；为了不误种植季节，为了战胜灾害，进行增种补种，为了发展林业、畜牧业和副业等多种经营，以及为了举办必需的地方工业等，所需要的劳动力则更多。其次，是生产的发展需要更合理地调剂和使用生产资料。比如，大搞水利建设需要进一步地调剂水源；为了按照地形、气候条件、土壤情况进行划片种植与专业经营，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因地制宜地调剂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三，为了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实现“八字宪法”，需要扩大经营范围，举办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举办足以培养农村建设人才的学校等。第四，为了便于集体耕作和减轻劳动强度，还必须逐步改善极其分散的居住条件，修建便于运输的交通道路，以及举办必要的社会福利事业等。显然，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当时只有几十户或者一百多户的、单纯经营农业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所能解决的。随着生产的发展，政权对生产的领导需要进一步加强。而当时的基层政权是以乡为单位，它虽然也领导了工农商学兵几方面的工作，但是如果沒有政社合一的统一领导，要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上述各项巨大的任务，也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也反映了当时基层的生产单位和基层政权之间的矛盾。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这是广大干部和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回答的。因此，在人民公社还没有出现以前，各地群众就已经仿照过去创办几百户、千多户的大社的经验，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和制度作过多方面的变更。当时四川就有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成为大社，有的已合并为一乡一社的大社，并且扩大了经营范围，开始发展自己的为农业服务的小规模工业；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改进了劳动组织，加强了社内外的劳动协作和生产联合，这种协作和联合有时不仅超过了乡界，而且超出了县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创办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组织。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开始将猪折价入社，发展集体养猪事业，大部分自留地也归社统一经营。广大群众坚信只有更大的集体才能更有力地战胜贫困，因此，合并小社，创办大社，已是势在必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根据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客观规律，根据当时群众的要求，及时地领导了这个运动。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中



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總結和提高了群眾的創造，發展了“具有很大靈活性”的人民公社這一組織形式。人民公社化運動，帶來了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方面的重要變革，這就是：使原有的集體所有制擴大了、提高了，並且帶上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使原有單一的農業生產組織，變成了工農商學兵相結合、農林牧副漁綜合經營的社會基層組織；使原來的農村基層政權機構和基層生產單位統一起來了。這種變革又立即反過來推動著生產力更大的躍進。這一點，同樣為人民公社建立一年來在發展生產方面所取得的丰功偉績所證明。四川省人民公社建立以來，不僅在農業生產和战胜嚴重自然災害的鬥爭中，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使全省的農業生產在去年大躍進的基礎上繼續躍進；而且，去冬還抽調了幾百萬勞動力大辦鋼鐵，有力地促進了鋼鐵工業的大躍進。

很顯然，右傾機會主義者所謂人民公社“辦早了”、“辦糟了”的胡說，是完全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也是完全違背客觀事實的。

和右傾機會主義者所說的相反，人民公社化是在我國農業合作化的基礎上，進一步地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途。

## 二

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基礎上，隨著生產的大發展，廣大農民要求適當改進原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分配制度。因此，在人民公社內部，工資制與供給制（主要是糧食供給）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就隨着出現了。為什麼我國今天的人民公社必須採取這樣一種制度呢？這是因為：第一，我國是一個有五億多農民的大國，不很好地解決廣大農民群眾的吃飯問題，一切工作都無法更順利地前進。所以我們自建國以來，就採取了一系列的方針政策來促進農業的發展，並且逐步地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例如：在土地改革後，有步驟地而又是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採取了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的方針；在國家與農民的利益的關係上，採取了兼顧的政策和等價交換的政策等。這些政策方針无疑是完全正確的，並且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是，由於我國過去是一個農業生產水平很低的國家，雖然經過几年來的努力，農業生產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吃飯問題仍然是個大問題，廣大農民每年要以純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來解決吃飯問題。人民公社化以前，農村中每年大體還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口多、勞力少的不能抗拒自然災害的“超支戶”，這些戶不能不依靠國家貸糧貸款、減免農業稅、實行社會救濟，依靠合作社實行社會保險、公益金照顧、定量分糧、允許超支等一系列措施，以及依靠群眾的互助互濟等，來解決吃飯問題。人民公社化後實行的糧食供給制度，正是國家和農業合作社一直採取的社會保險和集體互助辦法的繼續和发展，並且從制度上把它固定起來。毫無疑問，這個制度保證了農民有飯吃，解除了廣



大农民首先是貧苦农民“終年愁吃”的沉重負擔，因而也使他們能够心情舒暢地參加农業勞動。這是社會主義制度所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第二，人民公社實行這個制度是不是辦得到呢？我們回答是辦得到的。如前所述，由於人民公社集體力量比高級社大，生產力有了更大的發展，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不斷地增加，這就有條件在人民公社內部採取糧食供給制。即使遇到嚴重災荒，人民公社也有能力把農民的力量充分動員起來，战胜災荒。四川省今年遇到較大的災荒，正是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實行增種補種，並且節約地安排過日子，才勝利地渡過了災荒，保證了全體農民的吃飯問題。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根本看不到解決農民吃飯問題在我國現時情況下的重大意義，對於廣大農民首先是貧苦農民的迫切要求漠不关心，他們攻擊人民公社實行供給制是“違反了按勞分配的原則”，是“絕對平均主義”，叫喊“應當取消”。我們回答是決不應當取消。黨的八屆六中全會“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規定人民公社實行工資制與供給制相結合的制度，既肯定了現時的人民公社基本上實行按勞分配的工資制度，同時也肯定了帶有按需分配的萌芽性質的供給制度。這是一種很好的制度，是大有前途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按照四川省目前的一般情況，凡是有勞動能力的人，都在供給部分中占有按勞動量應當取得的一部分報酬在內，把這一部分報酬和工資加起來，差不多就達到社員總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純粹由公社供給的，只是喪失勞動能力的老人和沒有勞動能力的兒童。這個供給部分占社員的總收入的比重不過百分之三十左右。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行一定程度的社會保險和集體互助，既是社會主義制度不可推卸的職責，也是適合於廣大農民群眾當前的實際生活需要的。實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基本上還是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而不是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至於工資制部分，我們也同樣按照黨的八屆六中全會“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的原則，規定不同的勞動保持適當的工資差額。四川省內江县順江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按照這個原則預算分配的結果，社員從集體中分到的收入，勞力強的戶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五，而一般戶增加百分之二十六，勞力強的戶高於勞力弱的戶一倍還多；而就全社來說，百分之九十四點六的社員都比去年增加了收入。這個公社在一九五九年的預算分配，用工資形式分配的部分和用供給形式分配的部分的比例，將是七與三之比。以上事實都可以說明，人民公社實行工資制與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並沒有違背按勞分配的原則，因而也不是絕對平均主義。

不可否認，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但是它並不排除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出現帶有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因素。這種因素的出現是必然的，並且會隨著生產的發展，而逐步地擴大發展。



還必須承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物質鼓勵和政治挂帥是不可分割的。這就是說，在社會主義階段，我們應該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但並不排斥不計報酬、忘我勞動的共產主義精神，相反，我們應當鼓勵這種精神。社會主義建設是廣大人民群眾自己的事業。迅速改變我國貧窮落後的面貌，是我國六億五千万人民的強烈願望。通過黨的政治宣傳和號召，廣大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必然不可遏止地要在行動上表現出來。過去在革命根據地，我們的部隊、機關、學校都實行了供給制，廣大幹部和群眾並沒有斤斤計較物質報酬，總是前仆後繼、不屈不撓地犧牲奮鬥。大躍進以來，廣大人民群眾干勁沖天，自覺地忘我地勞動，創造了經濟建設突飛猛進的局面。所有這些，證明了黨的政治挂帥對於我們事業的極大重要性和決定性。因此，必須把物質報酬和政治挂帥結合起來，否定物質報酬原則是不對的，忽視政治思想工作也是錯誤的。

隨着農村生產大發展，帶來了農業勞動力不足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挖掘勞動潛力，特別是解放婦女的勞動力，以適應大躍進的需要。這樣，在大躍進中出現大批的公共食堂和托兒所、幼兒園等集體福利事業組織，也是很自然的。公共食堂的出現，保證了社員的勞動時間，增加了社員的勞動出勤率，提高了勞動效率。這就大大地減輕大躍進以來因為農業勞動量激增所引起的勞動力緊張的困難。公共食堂又是集體生活的組織形式。在目前情況下，廣大農民把公共食堂和人民公社實行的糧食供給制聯繫起來看待，堅信公共食堂能保障自己的生活，從而更加增強了他們依靠集體來战胜貧困和战胜災荒的信心。因此，公共食堂很自然地成為發展農村生產、生活和宣傳教育活動的中心場所。無怪四川農民說：“我們的食堂，是推不垮，解不散，擰不走的。”公共食堂是不是可以办好呢？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們確信人民公社能夠領導農業增產，保證農民必要的口糧，並且有條件保證種好所需要的蔬菜和喂養豬只。有此三者，加上建立必要的管理制度，為什麼農民不贊成辦公共食堂呢？還有，公共食堂是不是一定會浪費呢？回答是：只要實行糧食“依人定量，分配到戶，食堂吃飯，節余自得”的政策，並且提倡節約過日子，是完全可以避免浪費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把公共食堂說得一無是處，並且下令解散。這些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解散公共食堂，其目的在於搞垮人民公社。很顯然，解散公共食堂，是違背廣大農民的意願，是不符合大躍進的要求的，是十分錯誤的。

### 三

一年來的實踐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人民公社這種社會組織，是加速我國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強有力的武器，而且也是從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以至將來在農村中由社會主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的組織形式。

由農業生產合作社轉變為人民公社，使原有的集體所有制擴大和提高了，並包含了若干



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尽管这种成分在目前所占的比重还很小，但是，它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所有制发展的主要方向，对农村经济将愈来愈会起积极的主导作用。随着生产的发展，群众觉悟的提高，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将会逐步增长起来。这是必须看到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必须承认，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且，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共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这就是说，我们要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历史任务，就要积极地有步骤地解决为实现这种过渡所需要的各种条件，而关键在于人民公社要有强大的经济力量。

首先，必须加强对较穷的生产队的领导，在组织生产、安排生活和提留公共积累方面给予适当的照顾，再加上国家的援助，使较穷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比较迅速地赶上较富的生产队的水平。根据四川省的若干典型调查，在目前一万人左右的人民公社中，较穷的队与较富的队的收入水平，一般是相差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一万户左右的人民公社中，较穷的队与较富的队的收入水平，一般是相差百分之五十到六十。而农业的增长速度，在若干年内平均每年保持增加百分之十以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此，只要公社加强对较穷的生产队的领导和帮助，在二、三年或者四、五年内使较穷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提高到或者超过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也是完全可能的。

为了使人民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增加人民公社的公共积累，人民公社必须在保证国家和农民两方面粮食需要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营，实行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还必须在不妨碍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和国家允许的条件下，创办为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所需要的工业和企业，一个公社不能举办的，可以在地委、县委的领导下由几个公社联合举办或在县联社的范围内举办。这样，人民公社的经济力量就会迅速地增长起来，公社的全民所有制成分也将逐步地增加起来。重庆市郊区红旗人民公社是一个“万人社”，由于生产的巨大跃进，今年提留公共积累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一倍半。公共积累的增长，使公社经济壮大起来，今年这个公社直接经营的工业和其他多种经营的产值可达五十八万元，占全社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五。预计到一九六一年，公社直接经营的工业和其他多种经营的产值，可以达到占全社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坚决要求保持公社的基本所有制，实行部分的生产队所有制。目前类似这种情况的人民公社，虽然只是少数，但从这些公社生产的迅速发展中，明显地看出了公社经济发展壮大的必然趋势。

要使人民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除了实现上述的几项重要措施外，还必须加速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为了逐步减轻劳动强度，大大提高生产力，不仅地广人稀的地区需要加速实现机械化，就是人口稠密地区也不例外。问题是在于人民公社



有沒有充分的資金积累，尤其是取决于国家工业化的速度。在资金方面，我们认为，主要的应当通过人民公社逐年提留公共积累，通过逐年扩大再生产，再加上必要的国家援助，来加以解决。有的公社已经是这样做的（例如郫县红光人民公社）。既然这些人民公社现在就能办到，那么，一些条件较差的人民公社，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以后，为什么不可以同样办到呢？至于我国的工业发展速度能否与农业机械化的要求相适应，我们认为是可能的。我国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实行工农并举的方针，是包括了农业机械化在内的。我们已经在大跃进中给工业布局打下了基础，因此，今后可以逐步增加农业机械的生产，支援农业。同时，我们采取半机械化作为向全机械化的过渡，这就为农业机械化准备了技术条件，因而，也可能缩短农业机械化的时间，使农村一切可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地方，有步骤地但又比较迅速地实现农业半机械化和机械化。

只要我们通过人民公社，在一定的时间内使较穷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只要人民公社实行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并举的方针，并且发展必要的为国家所许可的社办工业，又能够使人民公社具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从而也增加了公共积累；只要我们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积极地发展农业机械的生产，就能够促使农业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提早实现。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又将相应地要求人民公社改进自己的组织规模和各种制度与之相适应。那么，根据中央北戴河会议决议的精神，我们完全有根据地设想，在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大部分地区的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是可能办到的。在这个任务实现以后，人民公社将进一步担当起由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任务。



夜 收 (木刻)

乐 恒



# 为加速实现农业技术改造的 伟大任务而奋斗

薄一波

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論文中提出的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驟应当和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驟相适应的方針，我們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并且在农业合作社得到巩固和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一九五八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總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化运动进一步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农业生产同工业生产一样地实现了大跃进。这样就使农业的发展进一步适应于工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并且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为着使工业和农业能够更相适应地和持續不断地向前大跃进，当前我們的任务，就是要在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积极地和逐步地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这就是党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針在新形势下的新內容。具体地说来，就是要把我国的农业生产，从主要地使用手工工具和畜力工具，改变为主要地使用机器；从主要地使用人力和畜力，改变为主要地使用机械动力和电力；从主要地使用人力加工肥料的状况，改变为主要地使用机械制造肥料（其中包括化学肥料和有机肥料）的状况；以便在較短的时期內，使我国的农业从目前的落后技术轉移到现代化技术的基础上来。

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为社会主义先进工业国的过程，也是把大量的农业人口逐步地轉变为工业人口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为了使农业的发展能够适应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門发展的需要，从而促进它們的发展，一方面，我們必須使农产品的生产愈来愈多，农产品的商品率愈来愈大；另一方面，又要使农业占用的劳动力愈来愈少，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愈来愈高。

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和人民公社化的实现，不断地改革了农村的生产关系，使我国农业在基本上仍然是使用手工工具的条件下，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一九五八年我国的粮食产量达到五千亿斤，棉花产量达到四千二百万担，按人口平均計算，每人有粮食七百七十斤，棉花六



点四六斤，比上一年每人增加粮食一百九十斤，棉花一点三一斤，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要比較充分地滿足全体人民对于食粮的需要，要足够地滿足繁殖牲畜对于飼料的需要，我国的粮食产量，至少需要在現有的水平上再增长一倍以上。要比較充分地滿足我国人民穿衣的需要，除了积极地从化学纖維方面想办法以外，单就人民对于棉布、棉紗、棉絮的需要來說，棉花的生产至少也需要在現有的水平上再提高两倍左右。而其他农产品和畜产品則需要有更大得多的增长。这是一方面的情况。

另一方面的情况是：一九五八年由于工业、农业和其他各項事业的大跃进，使得我国开始由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变成为劳动力相对不足的国家。不但城市新增加的劳动力已經不能滿足城市工业和其他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且农村在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虽然有很多妇女劳动力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了农村的生产和建設，还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以河北省宁津县紅光人民公社为例，这个公社一九五七到一九五八年度，比一九五六到一九五七年度，用于土壤改良方面的劳动力增加了一倍，用于肥料方面的劳动力增加了三倍，用于水利方面的劳动力增加得更多。在这期間，由于精耕細作的发展，平均每亩小麦的用工量增加了三点六倍，平均每亩棉花的用工量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其他各种主要作物的栽培，也都大大增加了用工量。这个公社原来共有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一万八千九百五十八人，一九五八年九月至十二月間調往城市支援国家工业建設的近两千人，轉入社办工业和其他事业的共有两千多人，因此留在社內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就比原来减少了。去年以来，虽然开展了技术革新，改进了劳动組織；今春以来，虽然有一部分劳动力从社办工业方面轉回到农业方面来，但是，全社劳动力的安排現在仍然感到困难，畜力也同样感到不足。

这两方面的情况告訴我們，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已經日益明显地暴露出一个新的矛盾，这就是：国家建設和人民生活要求农业生产成倍以至几倍地增长，而农业生产所占用的劳动力，不論从目前情况或者从长远趋势来看，都不但不能增加，反而将要不断減少。这是摆在我們面前的一个新的問題，应当有一个明确的方針来解决这个重大的問題。那么，应当怎样来解决这个矛盾、这个問題呢？当然，我們还应当从繼續提高社員劳动积极性、合理使用劳动力、改善劳动組織、推广先进生产方法、健全管理制度、巩固劳动紀律等方面，來想办法繼續发掘劳动力的潜力。实际上，我們在这些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应当看到，在广大农民目前普遍使用手工工具进行生产的条件下，这种潜力的发挥終究是有一定限度的。因此，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是加速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

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不但是农业本身、而且是工业的迫切要求，不但是广大农民、而且是广大工人的强烈願望。在个体經濟的条件下，这当然是无法实现的。在合作化时期，由



于我国的工业基础还很差，而合作社的规模还比较小，因此，那时的农业技术改造还只能采取典型示范的办法，小规模地推行。在现在，由于人民公社化的成功，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建成，已经给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人民公社比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规模更大，活动范围更广，集体化程度更高，它可以发展多种事业，进行多种经营。在人民公社内部，目前生产队所有制还是基本的，但是已经有了部分的公社所有制，公社可以每年从各个生产队提取一定数量的积累，可以发展社办事业，可以统一规划全社的生产和建设。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加速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的进程，有利于充分发挥农业机械的效力。

工业支援农业的力量已经大大地加强，我们过去不能生产的拖拉机和汽车，或者过去只能少量生产的排灌机械和化学肥料，现在都已经能够比较大程度地生产了。农村需要的钢铁、煤炭、石油、化工、电力等工业产品，现在也已经可以比较大程度地供应了。不仅如此，一九五八年工业的大跃进，在我国辽阔广大的土地上，普遍地举办起中小型的简易生产的企业，单是人民公社举办的农具制造厂和农具修配厂，就有八万多所。这种县办工业和社办工业，是加速农业技术改造的一支有力的突击队。

总之，实现农业技术改造的要求，是愈来愈迫切了；实现农业技术改造的有利条件，是愈来愈增加了。因此，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步骤来推行农业的技术改造，使农业的技术改造同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使已经在经济上巩固地组织起来的五亿多农民同现代化生产技术相结合，成倍地以至几倍地发展农业生产，几倍、十倍以至几十倍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大大地增加农民的收入，迅速地提高公社和国家的积累，广阔地扩大工业的国内市场。同时，在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进程中，我们的人民公社，就能够在日益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上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经过一定的时间，在条件完全成熟的时候，将首先实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然后再实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到那个时候，我国的农村，不但将为我国人民提供无限丰富的粮食、工业原料、畜产品和土特产品，而且将解放出成亿个劳动力来。这样雄厚的劳动力，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依靠这种力量，我们就可以在比现在大得多的规模上发展我们的工业，发展我们的运输业，发展我们的文化科学事业，发展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事业。就可以为我们国家、为世界创造出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有人认为，要实现农业技术改造，必须先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只要工业化完成了，农业技术改造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因此，他们主张现在应当集中一切力量发展工业，可以不管或者少管农业的技术改造。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当农业合作化还没有完成、工业基础还非常薄弱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使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同社会主义工业化速度相适应，经过合作化来促进工业化。在那个时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先有机械化、才能合作化的错误观点，批判了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这样两件事情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



的錯誤觀點，批判了只強調社會主義工業化而減弱農業合作化的錯誤觀點，這是完全必要的。因為當時如果過分地強調農業技術改造，其結果就必然放鬆和推遲合作化，同時也不利于工業化。由於新形勢的來到和新任務的提出，現在要批判的錯誤，顯然已經不是上述錯誤觀點，而是不積極推進農業技術改造來鞏固人民公社、來促進工業發展的錯誤觀點，是把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這兩件事情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的、只強調社會主義工業化而減弱農業技術改造的錯誤觀點了。因為現在如果孤立地強調社會主義工業化，不管或者少管農業技術改造，如果只顧工業本身的发展，而不採取積極的步驟加速農業技術改造，讓農業老是停留在手工勞動的水平上，其結果就不僅不能進一步提高農業發展速度，而且難以保持農業現在的跃进速度，反过来也就使工业难以繼續跃进。

有人認為，現在就積極進行農業技術改造，會分散使用建設資金和生產資料，而不利于工業的迅速發展。這種觀點也是錯誤的。他們不懂得，國家撥出一定數量的資金來發展農業，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商品糧食和經濟作物，有了這些東西，輕工業就可以得到更快的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更快地發展了，又可以為國家積累更多的資金，這樣，就可以加快重工業的發展。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過：“重工業要以農業為重要市場這一點，目前還沒有使人們看得很清楚。但是隨着農業的技術改革逐步發展，農業的日益現代化，為農業服務的機械、肥料、水利建設、電力建設、運輸建設、民用燃料、民用建築材料等等將日益增多，重工業以農業為重要市場的情況，將會易于為人們所理解。”<sup>①</sup>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論點，已經在去年的大跃进中進一步地得到了證明。一九五八年工業向農業提供的主要生產資料為三十一億五千萬元，相當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提供的生產資料總和五十一億九千萬元的一半以上；而農業在這一年向工業提供原料約一百四十億元左右，也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任何一年都多。因此，這一年在農業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五的同時，工業增長了百分之六十六，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年。這就說明，國家增加對農業的投資，增加對農業的生產資料的供應，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反過來，也就促進了工業的更大的發展。同時也說明，工業有力地支援農業，反過來，就會使農業能夠更有力量來支援工業。

這些人的錯誤，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因為他們不懂得，社會主義工業化不應當只是以建立工業內部的完整體系為滿足，而應當通過這個體系的建立來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特別是農業部門進行技術改造。他們也不懂得，社會主義工業化不應當只是以先進技術來武裝工業各部門為滿足，而應當使農業和其他國民經濟部門同工業部門一樣，都用現代化大生產技術裝備起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內容，就包含著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和電氣化。對農業和其他國民經濟部門的技術改造，這是社會主義工業化本身的要求，也是重工業各部門本身應盡的不可推卸的職責。以為可以脫離輕工業而孤立地發展重工業，是不對的；以為可以脫離農業而孤立地發展

<sup>①</sup>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頁。



工业，也是不对的。决不能設想，在我們这样一个有六亿五千多万人口而农民又占五分之四的大国中間，可以离开农业的技术改造而孤独地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也不可能設想，象我們这样一个大国，可以允許經常出現工业很快发展、而农业极慢发展的局面。在我們这样的国家，如果只是“一条腿走路”或者只是“一条半腿走路”，就会使我国五分之四的人口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那就不可能在工业战綫上和农业战綫上全面地展开轟轟烈烈的群众运动，我們的建設事業就难免不出現冷冷清清的局面。党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发展重工业和发展輕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針，反映了社会主义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这个重要規律的要求。实行这些方針就可以使我們能够避免社会主义建設中的各种片面性，而能够把六亿五千多万人民不論是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性都充分地发动起来，在国民经济的各个战綫上开展轟轟烈烈的群众运动，使工业和农业都能够互相适应地高速度地向前发展，并且取得国民经济的全面大跃进。

大家知道，資本主义的特点之一是工业同农业对立、城市和乡村对立。它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也需要农业的技术改造，而且也能够在一定規模、一定程度上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但是，它是建立在绝大多数农民破产和失业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必然是不断用新的技术来装备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的过程，也就是使乡村和城市的差別逐步缩小、使工农联盟更加巩固和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制度固然不能建立在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另一方面是个体經濟私有制两个不同的基础上，而且也不能够听任工业的现代化生产和农业的手工劳动长期并存。我国六亿五千多万人民中，有五亿多农民使用手工工具进行农业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商品率都很低，这是旧中国的遗产，是我国經濟落后的表现。当我们已經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已經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技术改造不但有同时并举的必要、而且有同时并举的可能的时候，如果还不积极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造，就会犯严重的錯誤。

在过去，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的；在現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也不应当离开农业技术改造而孤立地进行。我們应当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这样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看，应当使农业技术改造的步驟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驟相适应。可以肯定，沒有现代化的工业，就沒有现代化的农业；沒有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工业也就难以迅速地不断地向前发展。农业现代化的程度愈高，支援工业的力量就愈大，也就愈能够促进工业的迅速发展。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和人民公社化的胜利，我国的工农联盟已經牢固地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經濟基础之上。只要我們在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积极地和逐步地实现农业技术改造，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机器操作，使社会經濟面貌全部改觀，这样，我国工农联盟就能夠在同样水平的现代化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上更加巩固起来，为将来实现消除城乡差別和工农差别的伟大理想創造条件。

我国农业的合作化，是經過了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这样三个互相衔接的步

1959年



驟而进入到人民公社的。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造，将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經過由旧到新、由低到高、由少到多的过程，而逐步地实现。这个过程我們設想大体上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从今年起，四年左右得到小解决，七年左右得到中解决，十年左右得到大解决。这就是說，到一九六九年左右的时候，我国凡是可以使用机器耕种的土地，就可以基本上不再用畜力耕种，而基本上将采用机器耕种；凡是需要用机器灌溉的土地，就可以基本上不用人力灌溉，而可以基本上实行机器灌溉；农村运输就可以基本上不再用人力和畜力，而基本上使用汽车；农副产品的加工工具，都可以实行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全国生产的化学肥料，按每亩平均計算将比現在增加六、七倍。这样，就可以使我們在向自然界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主动，而使我国农业的面貌得到根本的改变。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地区辽闊，各地方的自然条件和經濟情況互不相同，由于工业支援农业的力量是逐步增加的，所以，农业的技术改造，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必須积极地而又逐步地实行。在目前时期，还应当新式机器和改良农具同时并举，洋的和土的同时并举。在四年以內，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分期分批地基本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而就全国范围多数地区來說，大量采用的将是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到了七年以后，大量采用的将是新式机器，而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仍将發揮它們的作用。

在目前，在第二个五年計劃期間，我們在进行农业技术改造方面，应当怎样来执行新式机器和改良农具同时并举、洋的和土的同时并举的方針呢？

就机械來說，一方面，多数地区，多数农业生产部門，是对現有的农具、提水工具、运输工具和农副产品加工工具进行改革，同时研究設計和試制各种新式的和半机械化的工具。各县，各专区，各省、市、自治区，都应当設立农具和其他工具的研究所，进行工具改革的研究和試驗工作。另一方面，在土地多劳动力少、交通方便、农产品商品率高的地区，如农垦地区、工业发达的地区、大城市的郊区、經濟作物区等等，应当积极进行农业机械化，并且首先把那些特別費力的手工劳动改变为机械操作的劳动。

就动力來說，一方面，多数地区，多数农业生产部門，主要是合理使用現有的人力、畜力、水力、風力和其他动力，并且認真保护和大力繁殖各种役畜。另一方面，一切有条件的地方，应当采用可能采用的机械动力，并且应当发展中小型的电站。

就肥料來說，一方面，应当大量地发展畜牧业，增加畜肥、綠肥和其他有机肥料，同时积极利用当地的条件，制造肥效較高的土化肥。另一方面，国家应当积极发展化学肥料工业，迅速增产各类化学肥料。化学肥料的使用，应当首先滿足那些对国計民生最关重要的經濟作物和粮食作物的需要。

不論农村現有工具的改良，或者是新式机器的采用，都必須注意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都必須先进行試驗、然后逐步推广。那种不顧各地方农业生产的具体条件和不同要求，而采取千篇一律和一哄而起的做法，显然是有害的。特別要注意的是，我国农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



中积累了丰富的經驗，有精耕細作的傳統。在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形成以后，这种經驗和傳統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我們在进行农业技术改造的时候，应当吸收这些丰富的經驗，发扬这种优良的傳統，而不要随便否定它和丢弃它。

适应于在农业技术改造方面新式机器和改良农具同时并举、洋的和土的同时并举的要求，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同样必須实行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針。

大型工业企业是支援农业的主力军。我們应当积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大型工业企业，扩建或者新建一批农业机械厂、拖拉机厂、动力机械厂、化学肥料厂、农药厂、汽车厂等等，尽可能地多增产为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各种产品（包括石油等燃料在内），并且注意改进这些产品的質量，以便逐步地用现代化技术武装农业。

大量的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县、社举办的工业企业，是支援农业的地方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中小型企业分布面广，接近农村，能够更好地滿足不同地区的具体需要。它们不仅可以制造改良的农业生产工具，生产其他的农业生产資料，以补大工业的不足，而且还可以担当农业机械和其他设备的修理任务。同时，在劳动力資源上可以和当地农业生产结合利用，在物質資源上也可以充分利用那些为大工业所不能利用的零星分散的資源。我們应当积极发展这种中小型企业，并且进一步地使它们明确为农业生产和建設服务的方針，以便它们在农业技术改造方面能够担当起愈来愈多、愈来愈高的任务。

为了加速农业的技术改造，大型工业企业除了直接提供农业所需要的各种机器、动力、燃料和化学肥料以外，还应当尽可能地帮助中小型工业企业（包括县、社工业）的发展，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新的设备或者更换下来的旧设备，提供它们所需要的原料和材料，为它们培养技术力量等等，以便提高这些中小型企业技术水平，提高它们为农业技术改造服务的能力。

把我国地区这样广大、生产技术这样落后的农村，全部地改造成为拥有现代技术的农村，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現在的問題，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做好全面规划。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市、专区、县、社，以及各级的有关部门，对于农业技术改造的发展步骤，新式机器和改良工具的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分工合作，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互相支援，技术人材的培养和科学試驗的发展，都应当按照实际状况，进行全面的具体的规划。

我們有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針，有几亿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的坚强意志，有一支主力军和地方軍互相配合的工业力量，又有人民公社这样具有偉大生命力的社会組織，毫无疑问，我們一定可以在预定的时期內，完成农业技术改造这样一个偉大的历史任务。



# 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正確路線

——人民檢察工作十年的基本總結

張 鼎 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年來，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創立了我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丰功伟績。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已經被廢除，代之以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生產建設成就輝煌，人民生活蒸蒸日上；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和組織程度空前提高。現在，無論農村和城市，都是欣欣向榮，一片光明。我們的國家，已經以空前巩固和強大的姿態，屹立于世界。

在短短十年當中，我們國家為什麼能夠取得這樣伟大的成就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國人民經過長期奮鬥，在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後，成功地實行了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由於在整個過渡時期內階級鬥爭始終存在，無產階級革命就不仅要奪取政權，而且要在奪取政權以後建立起自己的專政，以鎮壓反革命的抵抗，保證實現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毛澤東同志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一普遍真理，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在理論上作了創造性的发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他在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寫道：“中國人民在几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並且“以此作為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及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毛澤東同志諄諱告誡我們：“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學會這一項對待反革命階級的統治方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政權，他們的政權就會被內外反動派所推翻，內外反動派就會在中國復辟，革命的人民就會遭殃。”<sup>①</sup>毛澤東同志這篇伟大著作，為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政策基礎。

<sup>①</sup>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9、10、14頁。



我国的历史事实，完全証明毛澤东同志的論斷是正确的。我国人民在取得政权以后，面临着新的艰巨任务，就是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国内外反动派时时刻刻都在妄想推翻我們，妄想在中国复辟。大家知道，蔣介石集团是我国历史上集古今中外反动統治之大成的一个龐大的末代皇朝。这个反动統治被推翻了，但它的阶级基础并不是一下就可以完全消灭的。这个反动集团所豢养的爪牙——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門头子，还散布在国内各个角落。这些反动阶级和反动势力，对于我們彻底完成民主革命，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和破坏。同时，美帝国主义乘着我們新中国建立还不久的时候，就在朝鮮发动了侵略战争，霸占了我国的領土台灣，并且千方百計地派遣特务間諜进来搞阴谋破坏活动，妄图恢复它在中国的反动統治。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发展，資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为國內最突出的矛盾。一部分抗拒改造的城乡资产阶级分子，不断地从各方面阻挠我們事业的前进；而殘余的反革命势力，则成了维护資本主义的急先锋。我国十年来的历史事實証明，国内外反动派是不会死心的，他們总是妄想阻擋历史巨輪的前进。

但是，国内外反动派的阴谋并没有得逞。我們的党和国家成功地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保証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一日千里地前进。我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殘余势力的专政，对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故視、破坏社会主义建設的社会勢力和社会集团的专政，都是彻底的，正确的，成功的。十年来，我們的国家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都團結起来了。并且依靠着團結起来的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力量，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派实行专政，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坏，不搗乱，也給工作，給以生活出路，讓他們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現在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在向好的方面变化，不少人已經改造成为新人。对于那些敢于造反，敢于搗乱的反革命分子，就坚决地予以鎮压。十年当中，我們国家运用惩办与寬太相結合的政策，針對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发动了群众性的鎮压反革命运动。这个运动深入到各个方面和各个角落，規模是巨大的，而且是一步一步深入的。結果，彻底而又准确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肃清了殘余的反革命勢力，取得了肃反斗争的伟大胜利。人民民主专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設的飞跃发展，开辟了广闊的前进道路；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設的伟大成就，又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奠定了坚实的經濟基础。

人民民主专政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运用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法庭和监狱等武器，来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派实行的专政。人民檢察机关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之一。十年来，我們国家在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过程中，十分重視运用人民檢察机关这个武器，米



同国内外反动派作斗争。

承担着国家和人民所赋予的执行人民民主专政任务的人民检察机关，十年来积极地投入了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始终把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人民检察机关通过自己的审查批准逮捕、审查决定起诉、出庭支持公诉、对劳动改造工作的检察、对社会改造工作的检察等法律监督职能，把自己的斗争锋芒，指向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派遣潜伏的特务间谍分子，指向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指向有严重血债和民愤很大而又拒不投案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指向严重破坏经济建设和社会治安的其他犯罪分子。同时，在这个斗争中，又注意了防止偏差，保护好人，保证了斗争的正确进行。这样，我国人民检察机关，在执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中，充分发挥了自己应该发挥的作用，获得了巨大的成绩。

人民检察机关所以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获得巨大的成绩，就是因为我们无论在方针政策、组织领导和工作方法方面，都坚持执行了党所制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正确路线；并且在执行正确路线的过程中，总结了经验，教育了干部，壮大了队伍。

在方针政策方面，人民检察机关历来注意严格分清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专政的矛头指向敌人，并且在对敌人的专政中，采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

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在我国具体历史条件下，大多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敌我矛盾。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是区分两类矛盾的关键所在。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已经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破坏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是反革命势力当中最坚决的部分，对他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实行专政。对于那些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资产阶级。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阶级的一面，又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所以我们就有可能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一般地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达到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目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资产阶级分子都能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就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发动过猖狂进攻。他们同人民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我们必须击退他们的进攻，才能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但是在处理上，只要他们没有触犯刑律，仍然可以不用法律惩办。至于对那些从政治上、经济上破坏社会主义事业而又触犯刑律的资产阶级分子，那是必须依法惩办的。

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在劳动人民当中也有它的反



映。我国劳动人民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觉悟是很高的，但也有极少数意志薄弱的人，受了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而发生犯罪现象。这种现象，在阶级斗争没有消灭以前，还会长期存在。但是，由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消灭了产生犯罪的经济基础和逐步清除剥削阶级思想，由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了用说服教育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因此，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越来越高，人民内部的犯罪现象越来越少。对于人民内部的犯罪现象，虽然也要依法处理，但这只是作为说服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同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至于那些已经转化为敌我矛盾的犯罪现象，那当然是属于专政的范围。

人民检察机关正因为在工作中严格分清和正确处理了两类矛盾，既防止了看不见敌我矛盾，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右倾偏向；又防止了夸大敌我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的“左”倾偏向；而且能够根据两类矛盾的互相转化，在处理方法上也随之转化。这样就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保护了人民。

人民检察机关对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惩办，历来是坚决的。因为，对敌人不能讲仁慈，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不这样做，就不能够迫使反革命分子放下屠刀，就不能够迫使反动阶级和反动派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就不能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国家在惩办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时候，根据不同情况，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这就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对于少数罪行比较严重的反革命分子，逮捕起来，判处徒刑；对于其中极少数罪大恶极、非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则判处死刑；对于占大多数的一般反革命分子，则是留在社会上，采取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监督生产等办法处理。反革命分子只要真正改恶从善，我们就宽大对待，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减刑、免予起诉、安置职业等，立了大功的还给予奖励。但是，经过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如果又重新犯罪，那就再捉再办。实行这个政策，就有力地打击和分化了反革命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的国家所以惩办反革命分子，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惩罚，重要的是为了剥夺他们赖以生存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条件，以便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根本上肃清反革命和消灭犯罪。因此，我们对于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实行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对于留在社会上的一般反革命分子，则把他们放在劳动群众的生产组织中去，依靠群众的力量来监督劳动和教育改造。由于我们采取了这种阶级斗争和革命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方针，多数反革命分子经过改造都在向好的方面变化，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已经改恶从善，得到了宽大处理。不少罪犯经过改造以后，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最近，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我们国家对于一部分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这些都说明了我们执行惩办与宽大



相結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結合的方針，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人民檢察機關堅持嚴格區分兩類矛盾，把自己的鬥爭鋒芒對準敵人，對敵人採取正確政策，結果就有力地保證了對敵鬥爭又狠、又准、又穩地進行，並且分化瓦解了敵人，對人民民主專政的鞏固，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在組織領導方面，人民檢察機關也一貫堅持執行黨的正確路綫，這就是：在党中央和各級黨委領導下，同國家的其他專政機關緊密合作和互相制約，並且把自己的專門工作同廣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密切結合起來。

我國人民檢察機關和人民公安機關、人民法院，都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武器。他們之間的關係，首先是互相合作的關係，共同對付敵人的關係，共同執行人民民主專政任務的關係，這是一個大前提。如果首先不是這樣一種互相合作的關係，就不能夠強有力地對敵人實行專政。我國的專政機關歷來是緊密合作、團結一致的。人民公安機關在對敵鬥爭中是英勇機智的，執行方針政策是正確的，對於案件的偵查、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以及治安保衛等工作，都是做得出色的。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是極其嚴肅、謹慎的。他們都模範地遵守法律。因此，人民檢察機關對於他們的工作始終給以積極的支持。當然，由於這三個機關的具體職能不同，在辦理案件的時候，有時也會產生不同的意見。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是好事。通過不同意見的爭論，作出正確的決定，更能保證三個機關在辦理案件的過程中正確地執行國家法律。因此，這三個機關的關係，又是在共同對敵的基礎之上，互相制約的關係。不僅人民檢察機關應當依法對人民公安機關和人民法院的活動實行監督，公安機關對於檢察機關的決定有不同意見的時候，也可以提出來；法院也可以通過自己的審判活動，監督檢察機關的偵查起訴工作。實踐證明，我國法律規定的這三個機關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制度，是優越的，執行的效果是良好的，既保證了我們有力地打擊敵人，又保證了對敵鬥爭的準確性。

我國人民民主專政所以具有無窮無盡的力量，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我國的專政機關是建立在具有高度社會主義覺悟的人民群众的革命鬥爭基礎之上的。

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我國勞動人民，很清楚地知道：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是革命前進道路上的障礙。因此，人民群众對於任何反革命破壞活動和其他犯罪活動，嗅覺和視覺十分敏銳。少數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事實上已經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人民群众的這種力量，是巨大無比的。人民檢察機關，同人民公安機關和人民法院一起，始終都是緊密地依靠這種力量，進行鎮壓反革命鬥爭的。在歷次鎮反運動中，我們都大張旗鼓地發動群眾，教育群眾提高政治覺悟和革命警惕性，動員群眾積極地同反革命分子作鬥爭，号召群眾檢舉和揭發反革命分子。事實上，大多數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都是被群眾檢舉和揭發出來的，不少反革命分子在群眾壓力下被迫投案自首。當然，對於反革命分子的懲辦，那是由



国家专政机关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的。但是我国专政机关就是在办理案件的时候，也经常广泛地征求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比如人民检察机关常常采取携卷下乡、就地办案等方法，到群众中去进行辩论，研究某些反革命分子是否应该逮捕，是否应该起诉。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准确地打击了敌人，而且提高了群众的革命觉悟，丰富了群众的革命斗争经验。

对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的预防工作，对于反动阶级的残余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改造工作，人民检察机关也是同人民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一起，一向紧密地依靠人民群众来进行的。特别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当中，人民群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安全运动”，通过这个运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发生任何犯罪案件的农村人民公社和城镇基层单位。实践证明，安全运动是专政机关依靠群众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人民公社的一种好形式。

无论是国家专政机关的专门工作，无论是人民群众的对敌斗争，都必须完全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因为共产党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者，是代表工人阶级领导这个专政的。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使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十分艰巨、复杂、尖锐的斗争，取得彻底的胜利。所以要不要共产党领导的问题，乃是人民民主专政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事实上，十年来，我们国家的人民民主专政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为人民民主专政奠定全部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的，正是共产党；为人民民主专政制定正确路线的，正是共产党；在复杂的国内外阶级斗争中英明地领导着人民民主专政事业的，正是共产党。我们人民检察机关的经验也是如此，必须把检察工作完全置于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之下，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并且不断地用党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干部的头脑，增强干部的党性锻炼，才能胜利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最深刻的体验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人民民主专政。

在工作方法方面，人民检察机关从来就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

人民检察机关为了很好地执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一定要协同人民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对阶级斗争和敌我斗争的形势，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我国过渡时期的情况表明：阶级斗争和敌我斗争是长期的、激烈的；虽然从总的方面来说，随着我们的政权日益巩固，人民群众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日益提高，反革命总是越打越少，越来越弱，敌我斗争是越来越向有利于我们的方面发展的；但是这种发展过程，是一个曲折、复杂的前进过程，从敌人的活动来谈，是有起有伏的，从我们的斗争来谈，是有紧有松的，并且在一定时期内，从全国各个地区、各个方面来说，又往往表现为此起彼伏、此紧彼松的形态。为了切实地掌握阶级斗争和敌我斗争的这种实际形势，就必须结合党的中心工作，深入实际斗争，经常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否则，就容易脱离阶级斗争和敌我斗争的实际形势，不能适时地、准确地打击敌人。



同时，还应当协同人民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对反革命分子、反动阶级、反动派以及其他犯罪分子的基本情况，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根据社会阶级的政治动向，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人民检察机关应当经常对反革命分子的全面情况，或者是某种类型、某个地区、某个时期的情况，进行周密的调查工作，研究犯罪活动的规律和特点，以保证正确地执行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

对于每一个案件，人民检察机关都应当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做到实事求是。在处理案件的时候，详细地占有全部犯罪材料，周密地搜集各种犯罪证据，同时重视每一个反面材料和反证，进行全面的分析。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证据论者，反对不从实际出发，不充分搜集证据，不重视证据的主观主义的方法；反对不分析研究客观事物，不分析研究证据，只停留在问题的现象上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所规定的处理案件的原则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严格禁止刑讯逼供。人民检察机关和人民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一直是严格遵照党的这些原则办事的。

为了在全体检察干部中树立这样一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人民检察机关经常组织检察干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案件的实际情况，了解阶级斗争、敌我斗争的实际情况。同时，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于深入实际和学习理论，检察干部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不断得到发扬，保证了我们能够正确地执行方针政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保证了我们能够在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既具有充沛的革命热情，又保持科学分析的头脑；保证了我们坚持执行党所制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正确路线。

由于始终坚持贯彻执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正确路线，十年来人民检察机关在执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中，充分发挥了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在贯彻这条正确路线的时候，并不是没有遇到障碍的。在某些时候，还有人坚持一种同我们的正确路线相对立的错误路线。这种错误路线，主要表现为：混淆两类矛盾，忽视对敌人的专政，甚至把检察机关的斗争锋芒转向人民内部；忽视党的领导，片面地强调对人民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的制约作用，强调特权，强调独立性，脱离群众，孤立办案；脱离阶级斗争和敌我斗争形势，不调查，不研究，孤立地从法律条文出发，脱离实际，主观臆断。很明显，这种错误路线的基本倾向，是否定人民检察机关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性质，是动摇和阻挠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是用超阶级、超政治的虚伪面目伪装起来的资产阶级法律观点来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从内部来篡改人民民主专政职能的一种表现。十年来，我们不间断地同这种错误路线作了坚决的斗争，经过一九五二年的司法改革运动，特别是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这种错误路线受到了彻底的清算，人民检察机关的广大干部更加坚定地掌握了正确路线，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更加提高了。



在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我們國家已經進入了全面地大規模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已經空前鞏固和強大。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現在就可以放鬆警惕了。革命同反革命之間還會有長時期的鬥爭。我國社會主義還沒有建成，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還需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才能徹底解決。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集團還會不斷地進行搗亂。因此，繼續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來保證社會主義建設，仍然是我們國家的根本任務。作為人民民主專政武器之一的人民檢察機關，仍然要毫不動搖地執行人民民主專政的任務，堅持貫徹執行人民民主專政的正確路

## 換了人間

馬錫五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了。十年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祖国的面貌在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新旧中国两个时代、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本质，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本文仅就流氓、盗匪、烟毒、赌博、娼妓等社会污毒在解放前猖獗泛滥和解放后被迅速清除的情况来说明这个问题。

化思想的腐蚀以及失业、破产、贫困的逼迫，使得很多人走上邪路。反动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镇压人民的革命活动，更直接收买、利用大批坏分子，作为统治人民的爪牙。反革命势力与许多流氓、盗匪集团密切勾结，相互依存，并混为一体。各种坏分子虽然只占人口中的极少数，并且遭到善良正直的广大人民的痛恨和反对，但由于他们受到反动统治者的支持和纵容，而万恶的剥削制度本身又是产生各种罪恶的根源，因此，他们就能够猖狂地进行各种罪恶活动。

旧中国无论大小城市，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流氓组织。在他们的组织中设有大小头子，各占一行，各霸一方。许多大流氓头子都直接依靠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起家。他们广收门徒，豢养打手，积极扩张本门势力。上海有些大流氓头子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



綫，繼續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和理論水平，把勝利無敵的鬥爭進行到底。我們相信，只要這樣做，人民檢察工作就会在已往十年的基礎上，更好地完成人民民主專政所賦予的光榮任務，對於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

十年來，我國人民檢察機關在堅持執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所制定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正確路綫的時候，也認真地學習了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先進經驗。今后我們還將繼續向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學習，並且結合我國的具體實踐，不斷總結新的經驗，使我國人民檢察工作沿着正確的路綫，從勝利走向勝利。

成為參與蔣介石集團政治、經濟事務的“黨國要人”，他們的徒子徒孫滲入當時政治、經濟、文化各部門，為國民黨反動派充當特務。帝國主義租界的許多包探、巡捕，也是由這些人擔任的。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就曾依靠上海流氓所組織的“反共協進會”，發動了血腥的“四一二”大屠殺。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和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都曾指示他們的部下：“要盡量在流氓幫會內發展組織，做到組織內部非徒弟即兄弟。”

這些流氓充當反動統治者的幫凶，騎在人民头上稱王稱霸。上海蜜蜂毛絨廠流氓特務陳小毛，曾仗勢強奸女工一百多人。“滬西半爿天”柏文龍組織“挂戶黨”、“拆屋黨”、“斧頭黨”，按月向群眾勒索款項，稍不如意就唆使黨羽行凶，隨便殺害人命。廣州市“粵東五分社”等流氓集團曾專門“拉豬仔兵”，即強拉農民和外地客商賣給偽軍當兵。北平市“四霸天”之一的流氓頭子林文華，常拿活人當他練拳的靶子，不是把人打死就是打得吐血。天津市流氓薛桂芳養的狗，在玉生祥米面鋪偷吃東西被打死，薛桂芳就帶領打手先砸毀米面鋪，又迫使該鋪經理給狗買棺木做

壽衣，打幡送殯。這些流氓無惡不作，他們的活動範圍，涉及到凶殺、強奸、搶劫、偷盜、詐騙、敲詐勒索、包運烟土、包打群架、販賣人口、開設賭場和妓院等各个方面。

在舊社會，搶匪、盜賊、騙子也是成幫結伙。他們的罪惡活動，使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許多人因被搶、被盜、被騙而走投無路。據上海市偽警察局顯然縮小了的統計數字，該市在解放前夕每月發生搶劫、綁票案一百三、四十件，平均每天四、五件。天津市在解放前夕有搶匪八百余人，慣竊一万二千余人。江蘇省著名的盜匪集團“水火幫”，几十年來經常出沒于太湖、長江附近地帶殺人越貨。天津塘沽區著名海盜“慘死人”、“金牙老六”等時常結伙在海外外洗劫貨船，槍殺船主船工，沉船滅迹。重大的搶、盜、騙集團的頭子多與流氓組織、地方惡霸和偽警察局有着勾結。不少偽刑警人員就是大流氓的徒弟或盜賊集團的頭目。不少搶、盜、騙集團在作案後，按“規矩”都要提出一些贓款作為賄賂偽警察局的“積金”。農村中打家劫舍、奸淫燒殺的土匪時常被國民黨反動派成股地加以收編，作為鎮壓人民革



命活动的一种武装力量。

从英帝国主义开始向我国输入鸦片到全国解放前，烟毒在我国蔓延了一百多年。特别是日寇侵入我国以后，在沦陷区实行“毒化政策”，使鸦片烟毒更加泛滥起来。中国反动统治者历来就勾结帝国主义和流氓势力，把制毒、贩毒作为“生财之道”。解放前，仅上海一市的制毒机构就有三十多处，从事制毒、运毒、贩毒的有三万余人。在广州，据伪社会局一九四九年五月份不完全统计，全市烟馆共一千三百多户，有“烟馆多于米铺”之称。国民党反动派以禁烟为名，命令烟民登记，调整烟馆，便于官方统一专卖，所谓禁烟机构实际就是制毒和贩毒的机构，因此愈禁愈多。成千上万的吸毒者倾家荡产，有的骨瘦如柴，颠沛街头；有的沦为盗匪，为非作歹。

在旧社会，赌窟、妓院林立。帝国主义分子在上海、天津等地开设夜总会、回力球场、跑马场、跑狗场等大型赌场，每场都有千人以上进行赌博。地痞流氓也勾结官府大开赌局。广州的赌场有三千余所，以赌为业的约三万人，赌场专设电船七十余艘迎送赌客。至于供剥削阶级淫乐的妓院，则遍设于大小城市，国民党反动政府还以此增加税源。上海市在日伪统治时期，正式登记的妓女有二万余人；在国民党反动派接收以后，据一九四七年国民党“上海市年鉴”刊载，当时该市“依卖淫为活之娼妓，无论直接间接，估计不下十余万人”。各地妓院的窑主都是流氓恶霸，他们贩卖、诱骗、强迫许多贫困的妇

女做娼妓，以“卖绝”（妓女终身无人身自由），“挑养”（拐买女孩，养到十三、四岁即迫令为妓），“包账”（定期押卖），“拆账”（名为与妓女分账，实际上大部分收入归妓院主所有）等方式残酷压榨妓女，还强迫患病、怀孕的妓女接客，用皮鞭、铁棍毒打妓女，用烙铁烫妓女，有的被活活打死，甚至有的妓女患重病未死就被钉入棺材内埋掉。

旧社会的罪恶是数不尽说不完的，这是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是反动统治的必然结果。国民党反动派表面上也叫喊着禁烟禁毒、取缔娼妓、惩办盗匪、反对流氓，实际上这只是欺骗人民的惯技。他们自己就是罪魁祸首。他们也曾惩办过一些盗贼，除了因为反动势力内部有时发生磨擦外，不过是包庇“老虎”打“苍蝇”，甚至诬良为盗，借以蒙蔽群众的耳目。当时，许多重大刑事案件在作案后被群众举发，只要犯罪集团的“老头子”向伪警察局打个招呼，就可以安然无事，繼續作案。反动官员对社会上的重大刑事案件，甚至还直接参加。象一九四六年上海轰动一时的荣德生被绑架案的主犯就是国民党军统局特务，作案时用的“逮捕证”是伪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用的汽车是伪警备司令部的。湖南省邵阳市永和金店遭匪抢劫，并杀害两条人命，这一大案的主凶是湖南省伪第六区专员孙佐齐和专署秘书傅德明。武汉市刑警喻有才，是管领三百多名窃盗的头子，这些窃盗按月送款到他家。这样亦官亦匪、一身二任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广大人民深深地懂得，要依靠罪魁祸首的国民党反动政权来



改变旧社会的罪恶面貌，无异于痴人说梦。群众描述当时的情景说：“百姓吃不饱，警官养肥了，白天怕强权，夜晚怕强盗，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告”，真是一点也不假。

## 二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一个翻天复地的历史变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旧社会的一切妖魔鬼怪从此就失去了依靠。多年来被压抑的六亿人民的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下一触即发，就以雷霆万钧之势，扫除一切反动势力的残余。尽管旧社会遗留下的反革命分子和流氓、盗匪等坏分子成群成堆，尽管他们在失去靠山后还妄图继续与人民较量，但是，在伟大人民的铁拳下，这些妖魔鬼怪战不上几个回合，在短短十年时间内就被打得粉碎。

中国人民经过了十年的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英勇斗争，现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国泰民安，繁荣兴旺，不但反革命残余已基本肃清，而且刑事案件也已经大大减少。最近几年来，全国若干类重大刑事案件（包括凶杀、纵火、抢劫、强奸、盗窃、诈骗等）的平均发案率逐年下降，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四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六七。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以后，案件的下降尤为显著。仅北京、上海、湖南、陕西四个省、市，今年上半年初审刑事收案的总数，就比一九五八年同一时期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三点五四。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干劲冲天地

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流氓、盗匪横行和烟毒、赌博、娼妓等社会污毒泛滥的现象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了。抚今追昔，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幸福。

在我国，那些长期勾结国内外反动派压迫人民、罪恶滔天的恶霸兼大流氓头子，那些长期被国民党官僚、特务所掌握的封建帮会和政治性的流氓组织，在一九五〇年开始的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就已经受到粉碎性的打击。旧社会那些在城市中分股活动、奸淫邪淫无所不为的大小流氓集团及其骨干分子，相当一部分已在解放初期受到惩处，剩下的残余党羽经过以后几年的惩办和改造，现在也基本上肃清了。上海著名的游艺场“大世界”，解放前从总经理、高级职员到一般管理人员，几乎全是流氓，场内到处都有特务作恶，流氓行凶，扒手偷钱，妓女拉客，骗子行骗，还有许多荒淫下流的黄色节目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这是一个典型的诲淫诲盗、藏污纳垢的罪恶场所，也是许多善良的人们遭受迫害和灾难的火坑。解放以后，“大世界”经过民主改革、反霸斗争，已经彻底改变了面貌，成为劳动人民休息娱乐和受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幸福场所。许多解放前到过大世界的中外人士都感慨地说：“大世界真的变了！”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它不仅反映了“大世界”的变化，而且象征着整个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各个角落流氓恶势力的连根铲除。现在，在我国各地，不论是工厂、农村、街道、码头、车站和娱乐场所，人们再



也看不到橫眉豎眼的流氓作威作福欺壓人民了。

在解放初期，我們消灭了成千累万的反革命股匪和許多职业性的盜匪集团。从第一次鎮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搶劫案件就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直線下降。目前，这类案件已基本肃清。以一九五八年若干省、市搶劫案件的收案或发案率为例：辽宁省初审收案比一九五〇年下降了百分之八十七，天津市初审收案比一九五〇年下降了百分之九十六点三；上海市的发案率比一九五〇年下降了百分之九十八点七七。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在大陆上，而且除蒋介石集团盘踞的台灣外，也反映在我国领海上。前面說过的天津塘沽区沿海一带，解放前海盜活動甚为猖狂，解放后，十年来同一地区內从未发生过海盜案件。人民群众对匪患的清除是极为满意的，他們热情地歌頌道：“自古到民国，土匪未肃清，来了共产党，土匪断了根。”

在城市中危害面較广的窃盜、詐騙两类罪犯，解放后，經過历次运动的打击，不但作案的数量大大下降，而且旧社会遺留下来的那种师徒相授、父子相传的老慣竊、老騙子和成帮結伙的窃盜、詐騙集团，也已基本上肃清了。如上海市一九五八年窃盜、詐騙案件的发案率比一九五〇年下降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天津市一九五八年初审窃盜案件比一九四九年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九点六一，初审詐騙案件比一九五〇年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五点五（如按发案时间計算，实际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三点四）。由于绝大部分老慣竊、老騙

子已受到惩办和改造，因而大案极少发生。旧社会因貧困所迫而淪为强盜、小偷的人，現已絕迹。解放前，上海的薪水弄石灰窑一带原是臭水浜，到处都是茅草棚，强盜小偷成群。附近居民有“宁坐三年牢，不住石灰窑”之說。現在，这里已經盖起了楼房，清洁卫生搞得很好，强盜、小偷已經肃清，家家戶戶都过着太平的日子。

旧社会数不清的烟、賭魔窟，已經摧毁无遗。許多在旧社会吸毒成瘾的烟民，都已在人民政府的教育改造下彻底戒除烟瘾，成为健康的公民。广州市的烟民金香，原来不会吸毒，自从到国民党的“禁烟”机关工作后，学会了吸毒，不但家財耗尽，而且連老婆、孩子都被他卖掉。解放后，这个“烟鬼”戒除了烟瘾，經過改造參加了工作。象这样“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金香的例子不过是千万事例当中的一个。賭博行为在全国范围内也已基本絕迹，許多曾染有賭博恶习的人提高了觉悟，連賭具也自动地交出来銷毀了。

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社会中压迫、蹂躪妇女的野蛮殘酷的娼妓制度，在我国已經最后地結束了。解放初期，我們有計劃地取締了妓院，严惩了一批妓院恶霸和人口贩子，解放了成千累万的陷身火坑的妓女，这是曠古未有的好事！北京市的妓女把它歌頌为：“春天的霹雷一声响，囚犯們打开地獄的門”、“千年的冰河开了冻，万年的枯树发了青”。这几句话真實地唱出了全国无数被解放的妓女欢欣鼓舞的心情。过去绝大部分身染梅毒的



妓女，解放后经过政府的教育改造，治好了疾病，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改变了游惰习气，学会了生产技能，已经纷纷走上工作岗位，并且建立了幸福美好的家庭。如在北京市某印染厂的一个车间里，有六十三名女工是从妓院里解放出来的。现在她们之中已有二十多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十几人参加了共青团，其中一个表现特别突出的，在一九五五年已被评为北京市的劳动模范和全国纺织工人的先进生产者。

十年来，犯罪分子经过劳动改造、思想教育转变成为新人，并积极参加生产建设的生动事例，也是不胜枚举。原来绰号叫“上海阿康”的流氓头目康妙根，手下有二、三百流氓徒弟，到处包打群架，敲诈勒索，经过劳动改造，认识了自己的罪恶，在劳动中表现积极，提高了技术，现在已是五级建筑工人，并带领二十多名徒弟学会了技术，大家都叫他“康师傅”。曾在香港行窃十八年的著名惯窃仇治本，一九五二年到广州后，被我收容改造，几年来思想上有了显著转变，在劳动中积极带头，并能帮助别人，今年五月已改变了成份，并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这都说明了新社会改造坏人的伟大力量。

### 三

十年来，我国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流氓、盗匪等坏分子和烟毒、赌博、娼妓等社会污毒的迅速被清除，使许多熟悉旧中国情况的外国人士感到惊讶。其实，这是我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是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发

展的结果，是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实施正确政策的结果，是我们坚持不懈地采取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同刑事犯罪分子进行顽强斗争的结果。

我国社会上刑事犯罪现象之所以大量地不断地减少，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要消灭剥削和贫困，消灭阶级，从而消灭犯罪的。我们国家的人民民主政权代表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利益，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对社会主义的一切敌人实行专政。“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sup>①</sup>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一小撮危害人民、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犯罪分子必然面临着被彻底肃清的命运。

我国民主改革的彻底完成和镇压反革命的胜利，为打击各种重大刑事罪犯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前提。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日益强大，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在群众中已经搞臭；我国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失业现象已经消灭，公共福利事业普遍创办。这就大大缩小了产生犯罪现象的社会基础和思

<sup>①</sup>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



想基础。特別是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在党的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大跃进，全国农村普遍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組織程度进一步提高，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活动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也就更加縮小了。

我們党所制定的对各种罪犯所实施的惩办与寬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是消除各种罪犯的銳利武器。除了对极少数罪恶严重和民憤极大、該杀而又非杀不可的犯罪分子依法判处死刑外，对于绝大多数犯罪分子都按其犯罪情节、悔过程度分別对待，从重或从輕判处徒刑，实行劳动改造。对于偶然发生輕微犯罪行为的人，一般采取教育的办法，不給予刑事处分。对于刑滿释放分子一般都安置就业，使他們用自己的劳动謀求正当的生活出路。十年来，我們已經改造了一大批罪犯，使他們由旧社会的渣滓变为新社会的劳动者，真正做到了化社会上的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是从根本上消灭犯罪的有效手段之一。

我們在打击刑事罪犯的斗争中，如同在肃清反革命的斗争中一样，一向是采取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由于我們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因而就能揭露一切公开的和隐蔽的犯罪分子，使他們到处陷于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无法藏身，更无法乘隙活动。這是我們国家肃清犯罪的无比强大的力量之所在。

我們国家肃清流氓、盜匪、烟毒、赌博、

娼妓等旧社会遺留下來的汚毒的成就是伟大的，但这并不是說，在这方面已經一点問題也沒有了。首先，还有殘余的坏分子，他們还要繼續进行破坏活动。同时，我們国家在資本主义的經濟基础被消灭以后，剝削阶级特別是腐朽的資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仍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內繼續殘存着，仍然会对少数意志不坚定的人发生腐蝕作用，产生新的刑事犯罪分子。还須特別指出，在我国，目前还有反革命分子，他們是产生刑事犯罪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在繼續肃清殘余反革命分子的同时，繼續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和彻底消除旧社会遺留下來的汚毒，仍然是一項长期、复杂、艰巨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制度是消灭犯罪的根本保証。我們确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今后犯罪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必将更加縮小，犯罪現象必将更进一步地不断地減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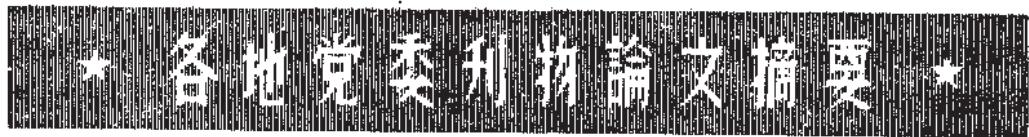
## 更 正

本刊上期(1959年第19期)第34頁注

①第2行“由于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和一九五八年重工业品降价較多”，应改为“由于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重工业品的价格逐步降低”。

第44頁倒数第8行中，“相当于一九四九年的五倍多”，应改为“相当于一九四九年的十倍”。





## 馬克思主義大放光輝的十年

據自“團結”(貴州)一九五九年第十期社論

过去的十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不断地获得辉煌成就的十年，是党的总路綫取得伟大胜利的十年，当然也就是永远光芒万丈的馬克思列寧主义大放光輝的十年。馬克思列寧主义所以称得上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仅在于它科学地論証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义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还在于它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应如何实现这个历史性的任务。无产阶级为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打破資产阶级的統治和鎮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建立起并不断地巩固住自己的政治統治权。在从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里，都必须如此。无产阶级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从以下两方面取得完成这伟大历史任务的力量：第一，不断地发展和加强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抗击国内外敌人的反扑，加速社会主义建設。第二，在本阶级内部特别是在这个阶级的先锋队内部，建立自觉的鐵的紀律，这是为解决第一个方面的任务所絕對必需的。

我們党制定的总路綫，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基本原理，并使这些原理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得到了創造性的运用和进一步的发展。我們党出色地解决了前述第一个方面的任务，即关于无产阶级要不断地发展和加强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的任务。早在民主革命阶段，我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即提出了著名的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阶段，群众路綫仍然是我們党在一切工作中所遵循的一条根本路綫。这个问题关系着馬克思列寧主义理論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果我們承認历史是人民群众創造的，而不是少数英雄人物創造的，这样一条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那就沒有理由不在一切斗争（不論是革命或建設）中貫彻群众路綫，就沒有理由不去充分发动群众。其次，要不要群众路綫，就涉及到我們是不是相信“工人阶级的解放應該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这一馬克思主义原理。就是說，如果我們以为人民群众的解放，是少数人可以恩賜的、可以包办得了的，而不是依



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那我們就不配称为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还有，要不要群众路綫，要不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也涉及到馬克思主义認識論的一个原則，即人的主觀如何正确反映客觀規律的問題。可以这样說，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精神或實質，馬克思主义學說的革命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信人民群众的創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正如列寧所說，馬克思“最重視的是工人階級奋不顧身积极創造世界历史的行动”。不待說，以毛澤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深刻領会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精神实质的。我們党的全部历史，特別是建国十年来的历史，說明了我們党在毛澤东同志领导下，对于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創立者們所最重視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勁和創造毅力这一問題，一貫地放在首先考慮的地位。无论进行任何一項社会改革和建設事業，都要貫彻党的群众路綫，都要放手发动群众。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正确地总结了这些运动的經驗，把它加以理論的概括，在一九五八年春党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提出了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这条总路綫的鼓舞下，出現了各个建設战綫上的大跃进形势，出現了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

可以这样說，有了轟轟烈烈的群众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就能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地向前发展，許多事情就能多快好省地进行。反之，如果没有这种群众运动，革命和建設，就只能是在少数人冷冷

清清的情况下进行，就只能是少慢差費。在热火朝天的群众革命运动中，先进的理論必然受到檢驗，必然会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革命的干部和群众也必然会得到鍛煉和提高。以毛澤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看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毛澤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中說过：“要大胆指導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經驗中将改造他們自己。要讓他們做，在做的中間得到教訓，增長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革命的敌人，反对群众革命运动，固无足論；而指手画脚地批評群众运动，或者前怕龙后怕虎，以无穷忧虑的态度对待群众运动，或者以种种清規戒律限制群众运动，都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馬克思列寧主义者所决然不取的。

无产阶级为要團結和率领广大群众前进，就必须使自己的阶级队伍特别是它的先锋队，表现出坚强的團結、极大的坚定性和模范地遵守鐵的紀律的精神。要别人不动搖，首先需要自己堅定。不如此，就不能够抵制和战胜資产阶级思想、习惯等保守勢力和小資产阶级松懈散漫情緒的襲击，也就不可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而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團結，就必须有自己的领导核心、自己的领袖。这个领导核心或领袖，是在群众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是无产阶级意志的代表，是千百万群众的化身，是广大群众利益和要求的体现者。不了解革命群众运动的伟大作用的人，往往也不能了解领导核心和革



命领袖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极其重大的作用。十年來的經驗一再証明，为貫彻党的总路綫，为捍卫馬克思列寧主义，就必须同一切离开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傾向，同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及其一切敗坏紀律和破坏党的領導核心的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过去十年里，我們党在保卫馬克思列寧主义原則的純洁上，在保卫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和党的队伍的純洁性上，也一直进行着頑强勇敢的斗争，并取得了偉大的胜利。目前，我国旧的經濟制度虽已基本上消灭，但資产阶级和小

資产阶级的殘余勢力，还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彻底克服；城乡反动資产阶级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虽然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斗争給了一次決定性的打击，但还远沒有彻底消灭。阶级斗争还在繼續进行着。这种情况，不能不在革命队伍內和党内有所反映。因此，加强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队伍的团结，加强党的紀律性，反对各种形式的右傾动摇，反对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就成为当前保卫和貫彻党的总路綫的一項非常重要的斗争任务。

## 坚持政治挂帅的方針

摘自“解放”（上海）一九五九年第十九期，

陳丕显：“坚持政治挂帅，加強党对社会主义建設的领导”

政治挂帅，是我党悠久而光輝的革命傳統，是我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設事業中不斷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証。

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政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任务。去年以来，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发出了万丈的光芒，革命的群众运动汹涌澎湃，愈益証明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的伟大作用。“政治挂帅”的方針，越来越深入人心了。但是，并不是說，我們所有的同志都懂得并且善于在一切工作中坚持这一条方針了。更不

是說，沒有人怀疑、甚至反对政治挂帅了。那些怀疑和反对政治挂帅的人提出了一些錯誤的論調。我們必須彻底地批駁这些錯誤論調，坚持政治挂帅的方針。

有些人說：“政治挂帅不能代替客观經濟規律”。他們把政治挂帅同經濟規律对立起来，在強調經濟規律的客观性質的借口下，否定政治挂帅对認識、掌握和运用經濟規律的决定作用。实际上，只有真正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觀（即辯証唯物主义世界觀），从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觀点来看問題，才能够去发现客观規律和認識客观規律。党的鼓足干勁、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



的总路綫，正是我国社会主义經濟建設的客觀規律的正确反映。有些人把“客觀規律”同“政治挂帥”对立起来，其实是把“少慢差費”作为他們想象中的“經濟規律”。极少数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是企图由此从根本上否定真正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設規律的总路綫，他們无非是想用資產阶级的政治挂帅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也有一些人，他們的心是善良的，但是他們不懂得政治挂帅对認識、掌握和运用客觀規律的重要意义，片面強調客觀条件，贬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因而有一个时候他們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右傾松勁情緒，对于一些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也不去动手做了，一些經過千方百計可以克服的困难，也不去克服了。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及时提出了“反右傾、鼓干勁”的指示，这一指示是反映了最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要求的，我們按照这个指示的精神去做，政治挂了帅，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就进一步鼓起来，生产就按旬、按月地直线上升。这不是正好說明政治挂帅对認識客觀規律、对促进生产的发展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嗎？

有些人說：“政治挂帅不能代替业务工作”。他們看不到：有两种业务工作，一种是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业务，一种是为資本主义政治服务的业务。任何业务工作都不能不由政治来挂帅。不由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便由資产阶级政治挂帅。我們一切經濟工作、文化教育工作、軍事工作都是无产阶级用以进行革命和建設斗争的工具，是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利益，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

我們都必須把政治和业务工作的位 置摆正，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列寧同志說过：“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sup>①</sup> 毛澤东同志早在一九二九年的時候就向我們指出：“認為軍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認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說‘軍事好，政治自然会好，軍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則更進一步認為軍事領導政治了。”<sup>②</sup> 毛澤东同志指出，这种思想发展下去，便有脱离群众，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險。在文艺工作方面，他指出：“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內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論或多元論，而其实質就象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艺术——資产阶级的。’”<sup>③</sup> 或者无产阶级的政治，或者資产阶级的政治，非此即彼，又如何能不坚持党的领导把无产阶级的政治旗帜高高举起呢？当然，为了把工作搞好，我們應該十分注意业务和技术的提高。但是在任何时候，都决不能放掉主导的一方面，就是要以政治作为业务的灵魂，以政治来指导业务，指导日常工作。沒有明確的政治方向，不認真做好政治工作和思想

<sup>①</sup> “列寧全集”第32卷，第71—72頁。

<sup>②</sup> “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87—88頁。

<sup>③</sup> “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867頁。



工作，那么业务也好，技术也好，一切都无从谈起的。

有的人說“政治挂帅是同‘物質利益鼓励’原則相矛盾的”。我們黨一貫主張把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同物質鼓励結合起来。只有坚持政治挂帅，才能更正确地貫彻“物質鼓励”的原則。什么是劳动人民最大的利益呢？这就是建立人类最幸福、最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只有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决彻底地执行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線，以最快的速度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并且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才是从最根本的利益上关心群众。也只有以这样一种政治理想去鼓舞教育群众，他們才能在大跃进中奋不顾身、不計报酬地忘我劳动。人們都还记得，早在去年大跃进中，广大群众提出的“几年辛苦，万年幸福”、“要政治挂帅，不要钞票挂帅”的口号，就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高涨。这是党长期以来坚持政治思想教育的結果。正象列寧所說，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識不可能自

发地产生，而“只能从外面灌輸进去”。有些人以为只有靠經濟上的刺激，才能鼓励劳动者的积极性，至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则放在极不重要的地位，因而他們所說的关心群众的物質利益，实际上就是放松或者放弃对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我們坚持政治挂帅，不仅从政治上引导群众，去为自己根本的最大利益而斗争，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无微不至地关怀群众；不仅从物質生活上关心群众，而且从政治上、思想上全面地关心群众。解放以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不断深入，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逐步改善，使广大群众日益看到个人的和眼前的利益依存于集体的和长远的利益，个人的幸福依存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共产主义觉悟和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从而更自觉地使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以更高的热忱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設。人民群众的这种高度的劳动热忱，难道不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政治思想教育和物質鼓励相结合的結果嗎？

